

第三章 漢傳佛教的建寺文化

中國的佛寺

○胡人很努力並有目的至中土弘揚佛法

早期到中土努力宏揚佛教的都是西域的胡人，所以佛教還曾被稱為「胡教」、「浮圖教——胡圖教」。西元二世紀中葉以後，貴霜內亂，有大批大月支人逃回中土，而源出月支的“羯”族石越政權（西元319-351年）雖“兼從本俗”，亦以“佛是戎神，正所應奉”，更因聽佛圖澄之言兼崇佛教，故佛教開始盛行於北方各族之間。三國時代，五胡（匈奴、氐、羯、鮮卑、羌）內遷以後，胡漢通婚日久，後來胡人大部分融入“華夏族”，再也分不清楚其混血血緣的關係。

如大弘佛法的前秦符堅是“氐”人，隋唐王室至少有一半的少數民族血統，唐太宗李世民的母、妻、媳均為“鮮卑”人，武則天亦有胡人血統。尤其因民情互異，加上如前秦符堅（“氐”族，西元357-385年在位）、後涼呂光（“氐”族，西元386-399年在位）等等北方少數民族之胡人帝王的特殊考量，佛教的弘傳難免有其適應性的調整。

中國對西域佛法的引入，首先還只是帝王的“御用宗教”（Court Buddhism），慢慢才為宮廷王族和貴族所供奉的佛教（Gentry Buddhism）。後來為了適應風土、民情、國情，常做有選擇性的特意改寫、編造佛經，最後成為民眾膜拜的宗教（Popular Buddhism）。所以“漢傳佛教”並非原始佛教，先是依附道術，與固有道術並重，才能被漢人接受，而且後來經雜有帝王「牧民」用意的選擇與篡改，可知“印度佛教”傳漢以後，部分得不到忠實的翻譯，就有很大程度上的異離了，使得後來同一部經有不少譯本。

中國於西元第二世紀中、末期之後，隨著貴霜譯經僧與中亞及印度譯經僧之來華，在各時代，尤其南北朝各胡人帝王，都有崇佛或採用“佛教政治”治國之現象。如北魏（Tuoba Wei拓跋魏，鮮卑族，西元386-534年）的“永寧寺”，隋文帝建各地的“大興善寺”，武則天的“萬象神宮”或“明堂”及各州的“大雲寺”，北魏與北涼的造像石窟，都是沿襲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或「貴霜王朝」或犍陀羅的“大乘佛教政治傳統”與護法信仰。

在濃厚的“儒教治國”的系統下，佛教文化能夠涵蓋其上，讓帝王相信，進而推崇、護教，最後讓「一個偉大的宗教征服了一個偉大的（中國）文化」而且滲透成為中印文化融合的現象，又能夠保存至今，的確值得讚佩。

道安法師在《綜理眾經目錄涼土異經錄》中提到，河西一帶有多部經典是中土所沒有的，表示經典的翻譯及流布，有其教化之選擇性。因此，大陸學者季獻林教授也說：「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課題。公元前傳入中國以後，先是依附黃老之學，再譯經傳教，經歷了試探、適應、發展、改變、滲透、融合許許多多階段，最終浸溶成為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一部分。」

早期是王室（court）成員與中國的知識份子首先皈依佛教，此種“上層階級”的佛教形成，總是由“士大夫僧人”（Gentleman-monks）在領導著。後來才推動了民間社會對佛教信仰的理解，才有“民眾佛教”（Popular Buddhism）的興起與發展。

因為任何一種宗教誕生、成長、落定於另一種族的土地上，必然要改頭換面，才能適應新環境。“中亞佛教”在不斷被逼質變，已呈現多樣化，輾轉移植到中國以後，“漢傳佛教”信徒並不採用歷史的資料去考證據稱是佛陀教導的學說。常為了無數的矛盾無法解釋，“漢傳佛教”不得不編出一套獨特的「解釋學」，如「五時分教」、「八相成道」等說法，以免自相矛盾。而且也將中國固有的文化融入，形成特殊的“漢傳佛教”文化。

後來許多大師為了解釋各種「中國式」佛教與佛經，而十分苦悶，苦悶更加深了“漢傳佛教”的思索性，而造就了有別於“印度佛教”的哲學，後來發展出各大門派，各訂不同的戒律與宗法，或創造新佛經如《佛說三世因果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等。但是許多產生在中國的後造經，又總是標榜在印度就已經有了，並且冠上「如是我聞」，以免喪失了權威和真理性。

○中土建寺的目的

從漢代到唐代有兩種營造寺廟的途徑，最多的是“施主”（Danapati，陀那鉢底、檀那、檀越）營建後獻出，其他的才是僧人自建的。世俗的建寺施主可分為官方和私家兩類。“官方”營寺或為朝廷詔建，或是地方請建；“私家”營寺則是皇族、貴宦、官眾，或地方上的耆望、商賈、處士、富農。其中皇家造寺是屬於皇家的功德寺，以東晉、蕭梁、隋、唐為盛，是由皇族與外戚發願營建，常是為了立寺追福。“官方”營寺通常是皇帝以進行“弘教容僧”而下詔，由國家或地方官府出資營建。

不過，在南北朝時，皇族以國寺為家寺，很少是捐施自營。士族家寺如西晉烏程的無為古寺，相傳是“王衍舍宅”所建，可能是古時士族置功德寺的先聲。曾有梁侍中何敬容（齊武帝長城公主駙馬）被譏「又舍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構造，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眾造寺”焉。」

當時擁有豐富錢財的王公貴族，便以為通過建造佛寺、布施財物、持齋供養等等途徑，可以為自己祈福禳災。

漢代至唐之間的“檀越”對「施願建寺」、「功德轉讓」的信仰，大概有五種類型的心態：辟厄滌罪、福祚固宗、護產保業、憩隱放佚、皈依寄終。居於「辟厄滌罪」是為自己或親人祈祐平安，為故世的長輩先人追福的，大多是皇親、國戚和功臣階層，以東晉、蕭梁、楊隋、李唐最盛；對「福祚固宗」是祈求福祐皇朝、維固宗族的訴求，也宣示著對佛的感激和期盼。

如北魏文成帝為太祖以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尊，以敬佛與享先合一；「護產保業」的原因是為了要保護田產家園不失，並且能夠安全地傳繼給子孫，這是地主們最大的祈盼；「憩隱放佚」者，是標榜揮塵談空的人生，發散高蹈出世的意緒，通常應該是隱士的理想；到了「皈依寄終」時，已經是一心供養三寶，把佛國當作心靈的最終寄託，也是精神最後的家園。

官方和私家營寺的主要目的，不出護國、護教、護法、護僧、護眾、護境。當然平時或特定的日子會誦唱《仁王護國經》、《孔雀明王法》、《華嚴經》、《彌陀法門》、《藥師法門》、《觀音法門》、《瑜珈嚙口》、《梁皇寶懺》等等，以求冥陽共霽法益。傳到韓國、日本、越南、台灣等地以後，也都是如此。

晉唐佛寺大都位處優越地區，而且院落寬闊，房舍眾多，生活設施便利。因此朝廷、官府、客旅每以佛寺為客居之所。有時作為戰時頓兵之所，有時皇室在大寺安置宮眷，讓將廢皇后或先帝后妃、宮女入寺為尼。想上京考試的書生也借佛寺讀書，或作為經商、停客之用，也無法避免。許多朝士更兼學坐禪，以為退身之計。如此多元之利用，想必人來人往，一片繁榮氣象，佛寺於是變成為很重要的文化、經濟、軍事等利用的場所。

漢魏時代“只許胡僧立寺”，對佛寺曾加以禁限，後越中書著作郎王度之奏文提到：「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規。」

漢魏只許為西域僧立寺，當時的佛寺只為西域僧侶居住和宗教生活所使用，似有限制佛教在漢地的傳播，也禁止漢人出家。而百官私自發願造寺成風，後來又隨著西域僧人的行止設寺，於是成為早期漢地佛寺發展的方式。北魏興安元年（西元 452 年），文成帝下詔「諸州郡縣，於眾居之所，各聽建浮圖一所」，這是中土依行政區普遍建佛寺的先聲。

○中土古佛教建築的情形

漢武帝好神仙方術，在宮中所修築的觀臺閣榭，大多與神仙有關。故漢代宮觀建築與園林景觀，多半雜有神仙思想，對佛寺影響極深《洛陽伽藍記》另記載之「景林寺」、「大統寺」、「正始寺」、「河間寺」常有蓬萊仙館之建築。即寫景林寺所謂：「海內作蓬萊山，山中有仙人館，上有釣臺殿，並作虹倪閣，乘虛往來」。

皇興二年（西元 468 年），北魏獻文帝拓跋弘在平城建永寧寺，“構七級浮圖，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高峻），為天下第一”，為木構架的樓塔。約撰寫於北朝東魏武定五年（西元 547 年）左右的《洛陽伽藍記》一書，作者楊銜之於卷一云：「（西元 516 年，熙平元年，靈太后新造之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屠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三百多公尺，史上最高之塔）。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浮圖（塔）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軀，中長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織成五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僧房樓觀一千餘間，雕梁粉壁，青縑綺疏，難得而言，栝柏松椿，扶疏拂簷；叢竹香草，布護階墀。

是以《常景碑》云：『須彌寶殿，兜率淨宮，莫尚於斯也。』外國所獻經像，皆在此寺，寺院牆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之宮牆也。四面各開一門，南門樓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型制似今之端明。圖以雲氣，畫彩仙靈，綺錢青鎖，輝赫麗華。拱門有四力士，四獅子；飾以金銀，加之珠玉，裝嚴煥炳，世所未聞。東西兩門亦皆如之。所可異者，唯樓二重，北門一道不施屋，似烏頭門。四門外，樹以青槐，互以綠水。」

北魏太和元年（西元 477 年），國都平城（今之大同）已有佛寺近百所，魏境佛寺達 6478 所。孝文帝元宏遷都以後，欲改變前期濫建之風，立《都城制》規定，洛陽城內建一（新）永寧寺，郭內建一尼寺，餘寺悉建城郭之外。高三百餘尺的永寧寺塔是在“減食祿官十分之一”下營造的。又下令外州造寺須「本州表列，昭玄量審，奏聽所立」，讓漢地佛寺在國家的干預下，有秩序地興建。在佛教信仰的鼎盛時期，僧尼信眾達到兩百萬之多。而有「天下第一名剎」之稱的河南嵩山少林寺，是孝文帝為了安頓天竺來的高僧跋陀，於太和十九年下令建造的。但北魏後期卻未能遏止濫建之風，北魏延昌初期（西元 512-515 年）全境佛寺有 13727 所；魏末增至三萬餘所；北齊增至四萬餘所。

「建中寺，普泰元年（西元 531 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建義元年（西元 528 年），尚書令樂平王爾朱世隆為（爾朱）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僊居也。以前廳為佛

殿，後堂為講室，金花寶蓋，遍滿其中。」

「瑤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游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州；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有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僊。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九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妙，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疏連互，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雞頭鴨角之草，亦悉備焉。」

隋代終結了中國近三百年的戰亂與分裂，一改北周武帝廢佛之政策，開皇（西元 581 年）初，一度奉行「有僧行處，皆為立寺」的政策，“聽認出家，……營造佛像”、“詔州縣各立僧、尼二寺”。原是北周大興郡公的隋文帝楊堅，十三歲前，曾被比丘尼智僊撫養於今陝西大荔的馮翊般若尼寺，又被某高僧托說他是月光童子降生的，與佛教因緣深厚。登基時宣稱：「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咐囑。」即位後下令修復北周廢寺，在“五嶽及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

鑑於歷代帝王崇佛與廢佛的歷史教訓，建立“以儒學為核心，以佛道為輔助”調和儒釋道三教思想的統治政策，隋文帝在所經行四十五州建立“大興國寺”，又在四十州各造寶塔供養舍利。仁壽元年（西元 601 年）以後，取法北魏，改行“按州立寺”的方針，計先後五十多州起舍利塔。道宣說隋文帝“道化天下，三分其二”，即指隋文帝時有三分之二的州建有佛寺。並以沙門彥琮為翻經館大學士，後即命僧為官。展現了隋朝一統天下，以君權弘教的威德。至煬帝時，也曾大造佛寺，廣度僧眾，自稱“菩薩弟子、皇帝總持”。但為時不久，即下令以僧定寺，強令無德僧尼還俗，而因僧廢寺。

唐（Tang dynasty）初高祖李淵詔敘三教先後：「老教、孔教，此土之墓；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今可老先，次孔，末後釋宗。」並沒有出現如魏、齊、隋那樣濫建佛寺的情形。唐太宗在原戰場（交兵之處）建有七寺以立紀功業，如汜水的等慈寺，以靈塔、層閣為主體，輔以僧坊，繞以修廊，旁開禁苑、蓮池，清幽宜人，是園林式的「祭寺」。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648 年），“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其時全國有 5358 州。高宗乾封元年，封禪泰山，詔“天下諸州，各營一寺”，以示“推功大聖”，全國佛寺增至四千餘所。

唐代載初元年（西元 689 年）七月，武則天應偽造的《大雲經》所寫“女主

當國”的假預言，“頒制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以示感戴，採取“舉佛抑道”的措施；唐代中期佛教特別發達，唐玄宗開元盛世時，官方對佛寺設賜有定額，恪守“州別一寺”，故計應有 5358 座寺院，實際則建有僧寺 3225 座、尼寺 2122 座。

非額定之私寺，則稱為“招提”或“蘭若”，是不被政府認可較小的寺廟。開元二十六年（西元 738 年），唐玄宗自紀功德，敕“天下諸郡立開元寺”；會昌年間（西元 841-846 年），唐武宗禁佛，史稱廢天下佛寺四千六百所，“蘭若”四萬，檢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以唐代人口約五千萬人，供養五千餘寺，二十餘萬僧尼，為經濟能力之臨界值，所以唐代設佛寺的定額，用以控制全國的佛寺規模，以免生產失衡，導致社會動盪。

《華嚴經》以毘盧遮那佛（Vairocana Buddha）為“法身佛”，“法身佛”本沒有形象可見，中土則以盧舍那佛（Rocana Buddha）為其“報身佛”。《華嚴經》演化出千（葉）如來的思想，所謂「一葉一如來，一沙一世界」的觀念，推及之皇帝象徵如毘盧遮那佛，各州是千葉如來，百姓是百億釋迦。

建造大佛原是“大乘佛教”的特色，武則天與高宗則在龍門建奉先寺八十五公尺的毘盧遮那佛像，用以紀念唐太宗，可是卻將自己的臉龐刻為佛面。後來大半數的韓、日兩國的君王也效法起來，但都必須決定於君王對佛教的好惡與否。

大周垂拱元年（西元 685 年），武則天用薛懷義為“佛教政治”立國的要臣，如宋朝司馬光後來在《資治通鑑》中寫到：「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為使，凡役數萬人，……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節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為辟雍之象，號曰萬象神宮。……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

道宣斥隋寺失度，是為“末世造寺”。道宣主張依循天竺舍衛城祇洹精舍的圖樣為範式，推出一幅標準多院式寺樣——《戒壇圖經》，足以顯示當時京師大寺的構想，不難想像這種布局規制，很像在建造一座「大佛城」。此圖顯示為一所橫連四院式佛寺，是以後殿為中軸線之中心，向前、左、右開展出來的建築群。中為主院，由三條橫廊將中院分隔為縱聯四院式。在通過中院的中軸線上，依次建前佛殿、七重塔、後佛殿、三重樓、三重閣，形成主體組群。在三條橫廊上和後廊內，依次有左右三重樓、左右五重樓和東西佛庫，皆對稱而立。中院左側橫聯兩院，右側橫聯一院，三旁院內有各被廊牆分隔的五十餘個小院，每小院中央各建一殿或亭。

唐代宗大曆時，曾命僧道義依其所述在五台山之「幻見」，建造了金閣寺，此寺布局為縱列三院式：中院之山門是「樓閣式」，中院主體是三層佛閣，後有大食堂。與中院兩廊連通的東院和西院，又各為「橫聯六院」。

唐文宗開成五年（西元 840 年），日僧圓仁到五台山，見山旁竹林寺有六院：律院、庫院、花岩院、法花院、閣院、佛殿院，其布局應是以佛殿院、閣院前後縱列為中院，另四院兩兩縱列為東院和西院，合成為一座橫聯六院。五台山這兩座寺，同為《戒壇圖經》所主張的範式。而後世盛行之寺院布局，以中軸線對稱之結構便已然形成。佛寺中院中軸線上的建築群，有佛殿、重閣、講堂、天廚，天廚之後，倉、庫對稱。中院周側，則為僧伽院、臧獲院、佣保舍、牛馬舍等。

晚唐詩人杜牧（803-852）曾寫〈江南春〉說：「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而北魏六朝時，王公貴人常捐捨王侯宅第改為佛寺，而園林景觀，殿堂廊廡，大多沿承未改，中土之佛寺更將神仙思想融合於建築中。隋唐之後，亦多承六朝（Six Dynastries），少有變革。至於今日，若未廣覽旅遊等之其他資料，將會誤認“漢傳佛教”的建築即是當時印度傳來之建築。甚至以為佛寺與氏宅、宮殿的一般布局視為“同構”，尤其各種經變圖所顯示的建築，就是描繪漢魏隋唐時代的中國建築樣式，讓人以為天上的宮殿就是如此。

五代十國時，北方佛教因政權更換頻繁，佛教的發展受到了限制；南方各國相安，社會安定，帝王都熱心佛教，所以南方佛教較為發展。歷史上都將後周世宗歸為滅佛的惡王，他在顯德二年（西元 955 年）詔令未經國家頒給寺額的寺院一律廢除，出家須經過嚴格的讀經試驗。嚴厲禁止當時流行的燒身、煉指等眩惑世、割殘肢體的行為，故史學家普遍認為他是在整頓頹廢的佛教，而不是毀滅佛教。

宋代立國後，宋太宗曾自稱“朕曩世嘗親佛座”，即給予佛教適當的保護，並設立「譯經院」（後來改為「傳法院」），又附設「印經院」。請來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施護等人翻譯經典。從太宗太平七年到仁宗景佑二年的五十四年間，共譯出梵本 1428 夾 564 卷，可見宋初朝廷對佛教的貢獻極大。

可惜到宋徽宗時，改宗道教，強令佛號、僧尼之名號等都道教化，對佛教的打擊甚重。宣和元年（公元 1119 年），宋徽宗受道士林靈素所惑，以“不廢佛教，則為中國禮義之害”，乃改佛刹為宮觀，稱佛為「大覺金仙」，使服天尊之服，連帶也使宋之「譯經院」消失。並改稱菩薩為「大士」、羅漢為「尊者」、和尚為「德士」、尼師為“女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致使後來造成佛、道不分，

佛教成為民俗信仰，變得華麗而庸俗。

北宋時漢地的佛教是以禪、教兩家，加律宗後則為三類，禪宗仍為主流。而宋、元、明、清大部分的帝王，採取嚴格管理佛教的措施，其大概情形歸納如下：一. 不准隨意私建佛寺；二. 不准隨意剃度僧尼；三. 施行度牒考試制度；四. 限制寺院經濟的過度發展。此些措施雖對佛教的快速發展有了限制，但仍有保護佛教的作用。

遼代之「耶律王朝」原是崇奉“薩滿教”的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後改幽州為燕京，佛教受到契丹貴族的重視，南京也成了整個遼代佛教發展的基地之一。遼代刻有的《契丹經》可能是現今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大藏經》刻本，曾東傳至高麗、日本。

金代與遼代之「耶律王朝」狂熱崇佛有截然不同，金世宗對寺廟建築屢作嚴格的限制，嚴禁民間建寺。大定十四年（西元 1174 年）詔諭：「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無令徒費財用。」。但經皇帝敕建，官府允許，仍可建寺，還可在政治、經濟上受到朝廷的照顧與扶持。所以金代所建的大多是“官辦寺院”，還兼作金朝皇帝的“行宮”。

○禪宗寺院與叢林制度

唐代禪宗（Chan、Zen school）興盛，禪宗是中國的土產，但是並沒有脫離「印度佛教」的臍帶。禪僧起初本無定居處，大多穴居山林野外，有“山岩空谷間，坐禪而龕定”的需求。而後先是在律院中設“別院”習禪，南宗初興則開闢叢林自立禪居，再發展而為「廊院式」的禪宗寺院。為了解中古以後的佛寺興建情形，從禪寺的興衰可看出現存諸古寺的特色，不如先由禪宗的“叢林制度”研究起。

禪僧穴居山林野地與天竺印僧苦行的生活相符，卻難以適應中國不同之文化、環境。禪宗的自由意識與勇於改革的特性，即產生了一種新的形態，但並未忽視原始的佛律，而是以比較合適於中國的制度來安處徒眾。如元代黃譜寫的《天下師表閣記》說：「蓋佛之道以達摩而明，佛之事以百丈而備。他師所昌，殊宗異旨。雖各名其家，至於安處徒眾，未有不取法於（百丈）禪師者。」

百丈·懷海禪師（亦稱大智禪師，生平年為西元 720-814 年）立《禪門規式》，敘說禪寺發展的歷程：「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雖系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定。……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即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

佛祖親囑授，當代為尊也。所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僧堂）設長連床、椀施架、掛搭、道具。」

從上可知禪宗初期的禪居僅設方丈室、法堂、僧堂，其唯樹法堂不設佛殿及佛像，正是禪宗的本色。逝於西元 866 年的臨濟宗創始人曾說：「你若求佛，即被佛懾」，到了唐昭宗天復三年（西元 906 年），福州永泰縣北山禪寺建成：亦無佛殿，但計方丈、法堂、禪房、客廳、香積、餐室，不下百數十楹，寺僧百餘眾，全永泰一大叢林也。

南宋開慶元年至景定三年間（西元 1259-1262 年），日本留學僧徹通義介其“遍遊徑山、天童諸禪刹，謁此間名納，見聞圖寫叢林禮樂”，手繪有“五山十刹圖”可看出當時禪寺興建的制式：杭州靈隱寺寺前有溪澗，從山門依序沿中軸線布置佛殿、法堂、方丈室、禪堂，而“山門”之左為鐘樓，之右為輪藏；寧波天童寺寺前有大池，從“三門”依序沿中軸線布置三世如來殿、法堂、掌光堂、大光明殿、方丈室，三門之左為鐘樓，之右為觀音閣。山或刹至此均指為佛寺之意。

這裡所謂“輪藏殿”，就是轉大經輪處，建有回轉書架以收藏經文。《佛祖統記》記載：「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誦經及不識字，乃於雙林道場，創“轉輪藏”以奉經卷，其誓有曰：有登吾藏門者，生生不失身，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則與讀誦一大藏經，正等無異。」而今西藏人手轉之小經輪，或許源自此典故。不過，有學者認為轉輪藏是偽託由傅大士所創，但自從轉藏輪發明之後，經教的神聖性於焉產生，少有人深入經藏，智慧之海已然人渺。

宋代朝廷注重“五山十刹”的設置，是根據衛王史彌遠的奏議。宋寧宗時代（西元 1195-1224 年間），在嘉定元年（西元 1208 年）由朝廷賜立南宋所轄十五座著名禪寺稱“五山十刹”，逐漸建立起一種經濟依賴關係，並憑藉佛殿所塑立的佛像，來威懾禪僧的信仰，其作用也達到控制禪僧的目的。《金陵梵刹誌》有關〈重修瓦官寺釐記〉說：「百丈瓶立道場，不立佛像以為卓識。及見宋元之季，宗師上講堂必先拈香而頌佛祝聖，心竊以為疑。」

浙江臨安徑山寺是南宋時期禪宗“五山十刹”之首，其平面比較簡單，被當作中期禪宗寺院的範本，日本後來以徑山寺為建寺制度，目前日本仍保存仿徑山寺的寺院。如建於西元 1249 年的建長寺，以大片圍牆圍繞寺院，圍牆開有寺門，進入寺門就可見到山門，從山門依序沿中軸線布置佛殿、法堂、方丈室，山門與佛殿間左右均以迴廊連通，梁思成曾說：「…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數院，圍繞迴廊…」，即是當時的特色。寺門與山門間之兩側，右為廁所（西淨），左是浴室（龍邊），此與“虎邊不怕臭”的民俗相符。《摩訶僧祇律》中也記有：「廁屋不得在

東、在北，應在南、在西」之規定。

禪宗寺院自唐、宋以來亦如各宗有“伽藍七堂”之稱的布置方式，其殿堂名稱為佛殿、法堂、禪堂、食堂、寢室、山門、廁屋或佛殿、法堂、僧堂、廚庫、山門、西淨、浴室。七堂的制度，在各宗稍有差異，則視地域、環境而互有增減，大寺除塔、佛殿、講堂外，還有鐘樓、鼓樓、戒堂等，配合教義需要各有不同。宋代以後淨土宗對一般信眾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雖與禪寺原始精神相斥，但禪宗也不得不把信仰調整為“禪淨雙修”，重點轉移到一心念佛上，因此拜佛的佛殿才成為禪寺的主要殿堂。明代時禪寺內就有了“念佛堂”，是延續了南宋“禪淨合一”的結果。

“山門”是寺院的正門，本來是牌樓形的大門，為四柱三門的形式，門頂採用樓閣的形狀，就成為三樓四柱，也仍然有三門，應該是將正門稱為“三門”，但是習慣視為某某山之正門，後來便稱為“山門”。但另有一說，即唐代三門實取“三解脫門”之意，有“空門、無相門、無作門”的含意，寺院中多設外（南）門、中門與內門三座門殿，“山門”卻是訛傳之說。

中國佛寺演進到後來山門內有天王殿，天王殿也有兼作三門或作寺院的二門，稱為“山門殿”，具有護衛之意，即將塵俗穢土隔絕在外，山門之內為修行之淨土。現在基隆市的十方大覺寺就是如此，而“藏傳佛教”的大昭寺也設有四大天王（Guardians of the four Directions）殿。

所謂“左晨鐘、右暮鼓”或許是清代以後才出現的語辭。鐘、鼓樓通常是為寺院報時、集眾敲鐘鼓而設的。鐘樓原設在寺院的東北角（艮方），宋以後逐漸往前推到天王殿的東側，但是到了明末才有與鼓樓相對的型制出現。唐段成式所寫《寺塔記》也提到「寺之制度鐘樓在東」，不過，元末以前與鐘樓相對的是輪藏樓，不是鼓樓。明代卻是輪藏殿與觀音閣對峙於佛殿兩側之間，後來鼓樓的出現並非為了取代輪藏殿，但最終是因為輪藏樓與觀音閣建築的消失，在清初即不再見有“左觀音、右輪藏”的建築出現。

“法堂”就是講堂，為宣講佛法、皈依、集會的場所。《六祖壇經》中慧能說：「我今說法，猶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如種子，迂茲霑洽，悉能發生。」《百丈清規》制：「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為尊也。」法堂即是提供“慧”的最佳場所，也是禪寺的中心，設有師子座，供演說佛法之用。東晉時寺院內就設有法堂，隋唐以後各宗都將法堂視為僅次於大雄寶殿的主要場所。可是宋明以後，禪、教、講寺制度融合，逐漸忽視了法堂，而專視佛殿為唯一重要場所。可惜，輝煌的佛殿逐漸出現，禪道生命則逐漸凋零枯竭。而佛殿職能的活動，更因法堂職能的減弱而增強，禪宗也不得不示弱了。

早期「禪堂」是禪僧坐禪、休息用的場所，禪堂還兼作「齋堂」，卻容易混淆，違背了“空”的禪環境觀念。叢林制度發達以後，齋堂分離出禪堂，形成專供靜慮的禪堂在西、飲食的齋堂在東的定制，而睡眠則另提供了「僧堂」。禪寺有“左（東）廚庫、右（西）僧堂”的約定安排。

禪宗以心傳心的教法重視嫡傳，對祖師塔與祖堂非常的重視，對於“付法、傳法”的方式，從禪宗出分五支以後，自然有其神秘感，尊師的倫理也如儒家般沿襲下來。宋白雲守端說：「天下叢林之興，大智禪師力也。祖堂當設達摩初祖之像於中，大智禪師像西向，開山尊宿東向，得其宜也。不當止設開山尊宿，而略其祖宗爾。」而天竺佛教絕無稱呼師叔、師伯之事，但有了祖師堂後，已無法避免如此俗世之稱謂。伽藍堂供奉的是護法神或土地，所謂「左伽藍、右祖師」是指宋朝時在法堂兩側的配置方式，與中土“左社右祖”的信仰相同。可是祖師堂與伽藍堂在明清時則分列於佛殿之旁，顯然法堂的地位已不如佛殿。

元代的帝王雖然奉佛，但是卻特別地崇“教”抑“禪”，是特別熱衷於修功德、做佛事。舉凡法會，念經、祈禱、印經、齋僧、修建佛寺，所有費用大多由國庫支付。忽必烈的太子出生後，就由海雲“摩頂而立”，用以顯示王權的正統性；太子登基前，都受有“沙門戒”；累朝皇帝均“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寶”。而元文宗帝圖帖睦爾時（西元 1328-1333 年在位），因《禪門規式》已經歷代增刪損益，出現不少雜本，僧尼無所適從，即敕命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重新修定，定名為《百丈清規》，對寺院僧團的上下組織體制、宗教活動、日常生活等，都有所規定。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為僧，深知僧事，即位後採行嚴格管理、恩威並重，曾親定僧人必修之經為：《心經》、《金剛經》、《楞伽經》三部。更直接干預佛教，“洪武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禮部照得佛寺之設立化分為三等，曰禪、曰講、曰教。其禪不立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見造之業，滌死者宿作之愆以訓世人。本月二十一日本部官欽奉”、“洪武二十四年，……今天下之僧多與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是等其教而敗其行，理當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禪者禪，講者講，瑜伽者瑜伽，各承宗派集眾為寺……。”

同年又頒布《申明佛教榜冊》言：「其禪者，務遵本宗公案，觀心目形以證善果；講者，務遵釋迦四十九年秋妙音之演，以導愚昧；若瑜伽者，亦於見佛剎處，率眾熟演顯密之教，應供……」，如此三令五申，顯見禪寺型制已有定案。

洪武十六年（西元 1383 年），杭州府學授徐一夔“奉敕撰靈谷寺碑”寫道：

「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東為大悲（殿），殿之西為經藏（殿）。食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丈近焉。而大殿之後則為“演法堂”……。而其為制以佛之當獨尊也，故於正殿則奉去、現、未來之像，其他侍衛神不與焉。以禪與食不可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庫院。以師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或涵於笑語而弗專做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宴安而弗檢故同台室……，此皆皇上萬機之暇慮思所及……。賜額靈谷禪寺，又賜田若干畝以飯其眾。」可惜禪宗到明代已成末式。

明代寺院之興建亦盛，曾多次刊印《大藏經》頒贈天下寺院，是希望通過經教能提高僧眾的水準。明永樂二十二年（西元 1389 年），僧人姚廣孝撰《天界寺毘盧閣碑》道：「毘盧閣，…上供法報化三佛及設萬佛之像。左右度以大藏諸經，法匱後延觀音大士…。」又明孝宗弘治十八年（西元 1505 年，歲次乙丑），《重修天界寺記略》言：「其毘盧閣永樂中所建，迨今弘治甲子，久而將頽……，大藏經置於其中，既將大雄、三聖、觀音、輪藏、伽藍、祖師等殿綴葺球珠，規制悉易觀焉。」

記略指出雖有輪藏殿，卻將《大藏經》藏放在毘盧閣內，而毘盧閣亦位於中軸線上，並與佛像同位，其於天界禪寺尊經之意甚明，也顯示寺方對皇帝所賜與經藏的重視。明代從世宗廢佛之後，佛教盛況大減，佛教開始脫離對朝廷的依附，而有獨力發展的驅勢，到明末終於高僧輩出，呈現短暫復興的現象。當然這裡指的是佛法的興旺，而不是佛教建築的興旺。

清王朝亦曾刊刻佛藏而企圖引導、控制佛教，雍正還親自編輯禪學語錄與《當今法會》諸書，以控制佛學。而寺院已將藏經閣置於中軸線的最末位，而不是在旁側，此與輪藏樓消失不再建，以及僧眾對御頒佛藏要特別尊重，頗有關係。少林寺內亦有明弘治年間所建的毘盧閣，於乾隆八年（西元 1743 年）曾奉旨頒《大藏經》貯藏在內，並定名為“藏經閣”。而《淨慈寺誌》記載：「毘盧閣，康熙二十八年（西元 1689 年）住持方孝建，乾隆五年改為藏經閣，上供欽賜龍藏。」

康熙年間重建靈隱寺時，在大殿前之左右分建東、西戒堂，有碑文記言：「殿之東為東戒堂，之西為西戒堂，法堂之東為東禪堂，之西為西禪堂。……古無戒堂而今有戒堂，……栖者眾戒為禪本…」，此由戒導向禪的意義，在當時影響很大。

清代禪寺與諸宗合一，太虛禪師在《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一文中說：「清中葉以後，各寺不以禪法反以寺廟產業為主。故其開戒說法的目的，反而成了繼承寺產的接待人了。……禪寺混合成內則禪講律淨，外則經懺齊談，即禪講淨律以究真，經懺齊談以應俗。天童寺齊備之。」本來寺前設放生池是天台宗的主張，

清代則因諸宗合一的結果，連禪寺前也設有放生池。後來如北平智化寺，雖直屬臨濟禪宗，在近代調查出寺中已無禪堂存在。連蘇州的開元禪寺亦無禪堂之設。明清兩代淨土宗的念佛法門獨興，有著強烈的世俗需求，禪寺彷彿已經不存，未能再現“唐宋之風”。

如今的禪寺與百丈禪師所制定以禪堂為主並重法堂的情形，相去甚遠。如嵩山少林寺，寺內尚存初祖庵與達摩洞。寺院沿中軸線依次為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方丈室與毘盧殿，這種布局是依明代禪院布置的；福建廣化寺是清代依舊制興建的。沿中軸線依次為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藏經樓，並對稱設置鐘樓、鼓樓、禪房、方丈室、客房、膳室等；寧波天童寺是禪宗大寺，沿中軸線設置天王殿、佛殿、法堂，法堂之上為藏經樓，法堂之後的西側設羅漢堂，佛殿內供奉三世佛與十八羅漢；湖北黃梅五祖寺是弘忍禪師所制，沿中軸線設置天王殿、大佛殿、毘盧殿（麻城殿）、真身殿等，毘盧殿前所設配殿分別為聖母殿、乾佛殿，另有方丈室、禪堂、寮房、客堂、戒堂等，另曾有天王殿但已毀；北京房山的雲居寺也是大型禪院，沿中軸線設置山門、天王殿、毘盧殿、大雄寶殿、藥師殿、彌陀殿與大悲殿等六進殿宇，另配有之鐘樓、鼓樓、僧寮多已毀。

中國古代的宮殿、衙署、佛寺、住宅均採“四合院式”的布局，是一種封閉性最強的建築空間，不過有了寬大的庭院，則變化靈活，提供了不少適應性。中古遺留下來的寺址、碑記、文誌，都可提供後代的我們，明白中國佛寺興建的歷史與文化。以象徵佛教宇宙觀所建立的佛塔寺，曾出現在天竺或藏地（如桑耶寺）。

雖然中國古代對“天極”的象徵，建造有“極廟”、“明堂——合宮”等建築「以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將建築物同宇宙的原型結合在一起。但是在“漢傳佛教”盡是模仿諸天淨土，極力鋪陳寺廟的華麗，鼓吹方便簡易的佛國淨土修行，並未於其建築上表現出宇宙的象徵。禪宗訶祖罵佛後，更無暇顧及宇宙的象徵。如今台灣信眾的“家家阿彌陀，戶戶觀世音”信念，也是戰後的特色。原來民間對佛教信仰的需求一直在轉變，寺院的布置也隨著在變。有帝王的干預，也有亂世的渴求，這就是“漢傳佛教”文化的特色。

附錄：禪宗之五山十剎

禪宗五山：

1. 杭州（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寺（徑山寺），創於唐天寶初年（西元 742 年）。

2. 杭州（臨安府）北山景德靈隱寺（雲林寺），東晉咸和元年（西元 326 年）建，宋景德四年（西元 1007 年）改稱景德靈隱禪寺。
 3. 杭州（臨安府武林縣）南山淨慈報恩光孝寺（淨慈寺），五代後周顯德元年（西元 954 年）建，南宋紹興九年（西元 1139 年）改稱淨慈報恩光孝禪寺。
 4. 寧波（明州府）太白山天童景德寺（天童寺），原創於晉永康十年（西元 300 年）於義興，唐至德二年（西元 757 年）移至今址，明洪武十五年（西元 1382 年）重定等級時，改列為禪宗五山之第二。
 5. 寧波（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寺（育王寺），創於南朝宋元嘉二年（西元 425 年），宋大中祥符元年（西元 1008 年）改為禪寺。
- 後元文宗（西元年 1328-1332 年在位）時，建金陵之天界大龍翔集慶寺獨為五山之冠，明朝依之。

禪宗十剎（十院）：

1. 杭州（臨安府）中天竺山天寧萬壽永祚寺（法淨寺）。
2. 浙江吳興（湖州府烏程縣）道場山護聖萬壽寺。
3. 南京（建康上元府）蔣山太平興國寺（靈谷寺）。
4. 蘇州（平江府）萬壽山報恩光孝寺（萬孝寺）。
5. 浙江（慶元府）奉化雪竇山資聖寺（雪竇寺）。
6. 浙江（溫州）永嘉江心山龍翔寺（江心寺）。
7.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閩侯雪峰山崇聖寺。
8. 浙江金華義烏雲黃山寶林寺。（雙林寺）
9. 蘇州（平江府）虎丘山雲巖寺。
10. 浙江天台山國清教忠寺（國清寺）。

○佛寺建築的材料

中國古代的建築材料以磚材、木料為多，通常木材作為主要結構材，再砌以磚牆，上蓋屋瓦，即可遮避風雨。而基礎、牆基、柱頭處也有石材為之，純以石材建造的，只有少數的小佛塔或祖塔。

建於遼統和二年（西元 984 年），位於今天津市薊縣的獨樂寺觀音閣，是現存中國最古老的木結構高層樓閣。也是建於西元 1056 年，遼道宗清寧年代，在今山西應縣的佛宮寺仍有純木造的木塔，總高 67.13 公尺，其八角形平面底層直徑 30 公尺，是全世界現存最早、最高大的木結構式建築。

現知中國最早的木結構建築，是五台山（Mt. Wutai）的南禪寺大殿，建於唐德宗建中三年（西元 782 年），因係為禪寺，樸素無華，沒有天花板的藻飾，

也沒有壁畫，直接出現眼前的就是柱、樑、桁、椽；同樣位於五台山的佛光寺大殿，重建於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 857 年），是中國現存第二早的木建築。

純以磚瓦建造的佛殿，有五台山顯通寺的無樑殿及峨嵋山萬年寺無柱無樑的磚殿；五台山顯通寺內另有以純銅鑄造的銅殿。

○懸空寺——在危崖建築的空中佛寺

中國現存有三座懸空寺，即河北滄岩山懸空寺、雲南西山懸空寺、山西恒（衡）山懸空寺。其中以山西恒山懸空寺規模最大、最壯觀。其奇妙處以「三步一廊，五步一樓，七步一龕，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懸崖，勾心鬥角」來形容最為貼切。

恒山懸空寺位於山西渾源縣城南三·五公里的恒山金龍口西崖翠屏山之峭壁上。此寺始建於北魏後期（西元 471-532 年），以後歷代均為重建，是中國地區罕見的高空木構造建築群。架築在半山腰的懸空寺，因河床淤積，位置最低的殿堂約距水面 26 公尺，最高的三教殿距谷底 58 公尺，形成一組錯落有秩的建築群。寺內有四十餘間樓閣，安排大殿、經閣、配殿與僧舍等建築，其中的大殿、經閣、鐘樓、鼓樓、碑亭都是重樓，配殿又建在經閣之上。

明代王湛初有詩讚稱：「誰鑿高山石，凌虛構梵宮，蜃樓疑海上，鳥道設雲中。」當地民謠曰：「懸空寺，半天高，三根馬尾空中吊。」不難想像此寺“險中求穩”的險峻之美。

懸空寺整座建築群面對恒山，背西向東，上載危崖，下臨深淵，背崖鑿龕，穿洞插樑，完全依照力學原理，半插飛樑為基，巧借岩石暗托，樑柱上下為一體，廊欄左右緊連，錯落有秩，迂迴相連，形成特殊的框架結構，增強了抗震的能力。懸空寺半藏於絕壁之中，突出的岩石減緩了山風的吹襲。恒山的主峰阻擋了陽光，使得每日的日照年平均時數僅有二小時。日照、雨水、風侵對其無損，所以能保存一千四百多年。

懸空寺原是純佛教寺廟，於金世宗大定十六年至十八年（西元 1176-1178 年）的維修之後，成為“三教合一”的殿堂，現存建築四十多間，有朝殿、會仙府、碧轄宮、純陽宮、樓臺亭、寢宮、梳妝樓、御碑亭等，分散在山腰、崖邊與坡道上。明代御史鄭洛作〈過懸空寺〉詩云：

「石壁何年結梵宮，懸崖細路小溪通。
山川繚繞蒼冥外，殿宇參差碧落中。」

殘月淡煙窺色相，疏風幽籟動空禪。
停車欲向山僧問，安得山僧是遠公。

* * *

昨過招提故不登，重尋蘭若問山僧。
峰頂青鳥來還否，洞口白雲去未曾。
誰結丹梯高萬丈，我聞佛法演三乘。
恁虛頓悟心無住，好步禪關最上層。」

○福州鼓山湧泉寺——台灣佛教的祖庭

台灣人的原鄉可說是福建、廣東一帶，而台灣佛教的祖庭就是鼓山湧泉寺。本世紀初葉，台僧的傳承絕大部分傳至自鼓山湧泉寺，此寺與台灣佛教的因緣濃厚，所以有特別介紹的必要。

鼓山位於福州的東南郊區，鼓山是大頂峰、白雲峰、獅子峰、鉢盂峰、卓錫峰、石傘峰的總稱，諸峰共有一百六十多景，山中奇石競秀林立，層巒聳立風光秀麗。湧泉寺就座落在如此風景絕佳的遊覽勝地，初建於唐建中四年（西元 783 年）有華嚴寺，宋時曾賜下禪院匾額，近千年來歷經唐代會昌法難、明代祝融之災與颶風吹損，清順治初年（西元 1644-1646 年）由僧元賢重修，康熙敕賜有親書之“湧泉寺”匾額，乾隆及光緒年間曾重修。

湧泉寺是福建五大叢林之一，傍倚白雲峰，前臨香爐峰，佔地二十五畝，主體建築是天王殿、大雄寶殿、圓通寶殿，兩旁偏殿三十餘座，依山形而上，氣勢磅礴。天王殿前有二座“千佛陶塔”，是北宋神宗元豐五年（西元 1082 年）的文物，東為“莊嚴劫千佛寶塔”、西為“賢劫千佛寶塔”，雙塔均是八角九層，高七公尺，塔基為石砌平台，塔身為仿木構造樓閣，上貼佛像一千又三十八尊，八角塔檐另有塑有僧人、武士像七十二尊，並懸掛陶鐘七十二個，塔座上塑蓮瓣、舞獅、侏儒，並有銘文刻記塑造年月。

建於順治十六年（西元 1659 年）的藏經殿，又於康熙年間重修保存至今，殿內藏有《大藏經》二萬多冊及血書。藏經殿後有念佛堂、客堂、大悲樓、大寮、庫房、齋堂、祖堂、印經樓、禪堂、學戒堂、方丈室。文革期間寺中元、明版的善本書有二千多冊被燒毀，明代的佛經刻版也多遭焚毀，損失慘重。

西元 1988 年由妙湛法師晉山以後，湧泉寺已步入正軌。山中勝蹟無數，泉水潺潺，岩壁題記甚多，值得一訪。

○小結

中國的佛寺太多，無法在本章一一述明。近兩千年來，為了佛教建築，已投入無以算計的人力、財力。不管真正的目的地是否已達到了拯救人心、啟發佛性的效果，佛教建築畢竟是延續中華文化數千年來的場所，應該值得珍惜。可是，如今中國大陸的佛寺大多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成為國民旅遊觀光的景點，並且發售門票，收入或許能維護建築物不讓繼續老舊破損，卻不足於“維修復舊”。

在中國接近城市的佛寺，自古就形成參觀、旅遊的景點，甚至是聚餐飲酒、閒話品茶、觀燈賞月、避暑納涼、觀戲購物的好去處。佛法已變得不很重要，修行淪為一種形式而已。

如今開放後被列為觀光的佛寺，在其寺內或附近亦開設有餐廳及飯店，供應葷食酒菜，成為一處處生意場所，看不到僧眾與佛法傳教。飯店的招客傳單就寫道：「夜幕低垂時，清風當空舞，明月松前照，邀三五知己把酒宴歡，人生夫復何求。還猶豫什麼？快來吧，千年古寺正在張開它的雙臂熱情地擁抱來自遠方的客人！」，不禁令人嘆息，彷彿是“末法”的景象。希望有識之士看完本書後，對“漢傳佛教”的未來應有所思考、有所助益。

中國的石窟群

位於中國的「四大石窟」是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已在上一章提及，下面提到的是中國境內主要的石窟群：

大同雲崗石窟

雲崗石窟（Yungang caves）是中國四大石窟群之一，已於200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文化遺產。雲崗石窟為中原地區大規模的開鑿石窟，以山西大同市（Datung）之西、武州山之南的雲岡石窟為最早。其中以北魏文成帝和

平元年（西元 460 年）開始，五年間所建立的“曇曜五窟”為最著名。拓跋鮮卑族帝王所下令開鑿的石窟，雖然是犍陀羅的“粉本”，但是仍帶有希臘、波斯的影響。以過去帝對釋迦佛，現在帝對彌勒如來，面像採「以帝為師」、「皇帝即如來」、「帝身為佛身」的雕塑。

由此可知在文成帝時，彌勒信仰已被帝王利用來抬高地位、維護統治的工具。它沒有明清時代的俗麗，仍呈現著原始的粗獷魅力，令人激賞。孝文帝於太和十年（西元 494 年）遷都洛陽，開始服制的改革，群臣亦改易漢服，此種南朝士大夫褒衣博帶的常服，也讓後來所雕的佛像服裝漢化了。

蒙古地區的傳說，是北魏俘虜了一百多萬漢人，帶到新都平城（大同附近），令俘虜們把崎嶇的山區脊變成了奇異的石窟和雕塑的畫廊，這是否真實不去管它，但是顯示雲崗石窟的工程浩大，是可以理解的。

雲崗石窟臨十里河，依山開鑿，東西綿延一公里，大大小小的窟龕約 252 個，現存主要洞窟有 53 個，造像五萬一千餘尊，與莫高窟、龍門石窟並稱為中國的三大佛窟藝術。北魏太和時，酈道元在《水經注》灑水條：「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州川水；武州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漁舍，並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靈岩，鑿石開山，因岩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目新眺；川水又東流出山。」可見當時該地有山有水，景色壯觀。進年來又進行過大規模的整理和建設，環境變得更加優雅。

雲崗 20 號窟是露天的大佛，高 13.7 公尺，結跏趺坐，雙手作禪定印，顯得雄偉肅穆。該窟原有前壁，遼代以前已經崩塌，造像完全露天。它的前面一片平川，視野開闊，在陽光下很遠就可見到它雄偉的影像。其鑿刻的手法仍帶有犍陀羅的藝術風格，佛像神態莊嚴靜穆，讓人肅然起敬。

像身的貼體袈裟衣紋是採用直平階梯式的刻法，細部刻以陰線紋，頭光與身光的外緣為火燄狀，絡腋上的連珠紋，則是波斯薩珊王朝時常用的裝飾紋。這尊是漢傳佛教最早的佛像作品之一，而有學者認為「武州（雲崗）造像，必源出涼州」，非直接接受犍陀羅的藝術風格。

雲崗 16 號主尊立佛高 13.5 公尺，高肉髻，旋渦波浪狀的髮型，廣額大耳。身著厚重毯披，右手上舉胸前，左手作手印；雲崗 17 號是彌勒菩薩交腳坐像，高 15.6 公尺。彌勒菩薩頭戴寶冠，右袒披肩，交腳約有 4 公尺；雲崗 18 號為高 15.5 公尺的立佛，左右有二菩薩。

天水麥積山石窟

天水麥積山石窟是中國四大石窟群之一，位於甘肅天水市東南 45 公里的麥積山，是西秦嶺山脈西端小隴山中的一座孤峰，有如一座狀似巨大「麥垛」的孤山，周圍山林奇郁，野花幽香，松溪映帶，環境宜人，為“秦地林泉之冠”。石窟就開鑿在山體的西南、南和東南三側的垂直峭壁上。

石窟於八十公尺高的懸崖峭壁上，上下有十餘層的棧道相通，層層相疊，上下錯落，密如蜂窩，為中國僅見的一座洞窟懸空的石窟寺。史籍稱：「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鑄石成佛，萬龕千窟，雖自人力，疑是神功。」此奇絕之境可想而知。

山頂有一座隋代的古塔，高 9.4 公尺。麥積山石窟始建於西元 402 年，東晉元興元年（另說是在公元 380 年，後秦時期就開始開鑿），北魏天興五年，歷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餘個朝代，經過一千五百多年的修增，其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交融，成為中國雕塑藝術史上的勝地。約在公元 734 年，唐開元二十二年，天水一代受到強烈地震，而使窟群分為東、西崖兩部分。

麥積山石窟是世界上唯一以泥塑和石胎泥塑為主要內容的大型石窟，採用“以形寫神”和“形神兼備”的手法，展現高超的中外傳統藝術的完美結合。麥積山石窟現存大小窟龕一百九十四個，東崖五十四個，西崖一百四十個，保留有各種藝術造像七千八百餘尊，古代壁畫一千三百多平方公尺，有“東方雕塑館”之稱。

另外，石窟還藏有青銅器、鐵器、陶器、瓷器、玉器、古雕版、古文書、書畫等二千多件文物。其中北魏的造像有一部分是薄衣透體的佛像和菩薩像的塑造，呈現偏袒右肩、衣裙貼體、凹線衣褶的工法，可以見到健美的體魄；鮮卑族北周的佛陀造像多作低平肉髻，薄髮無紋，圓臉短頸，衣著貼身，是“曹衣出水”的工法。有高僅 60 公分的小坐佛像，雙手撫於胸前，面露微笑，甚為傳神，表現高度的藝術妙境。

在高七十多公尺的散花樓上七佛閣上端，有北周時代的七幅飛天壁畫，每幅有四尊伎樂飛天，衣服、飄帶、樂器等都是彩繪，唯有臉與手足是薄薄的浮雕，呈現雕繪混合的整體美。最別緻的是雕出多層變化的佛龕像，其雕工之精美不可多見。

如有一龕，其中心雕出釋迦牟尼佛和彌勒並坐的造像碑，楣上層雕有七佛小龕，龕下布滿瓔珞，下垂錦繡天幕。竟然是由堅硬的石料刻出輕盈柔軟的織品，像綢緞又似絲絨，居然還有織品的光澤。另外更顯得誇張的巧思，是將長裙因坐

勢而下垂簇集成美麗的弧線，使整個造像形成雕刻、繪畫與圖案的混合物，是不輸於歐洲的。

其他如東崖摩崖大像，是麥積山石窟的標誌，有十六公尺高的釋迦牟尼佛像，還有千佛廊、踏牛天王等值得一覽的洞窟。中國大陸有關部門正加緊進行申報為自然文化雙重「世界遺產」的前期準備工作，將詳盡收集麥積山周圍地形、地貌、地質狀況、水文狀況及溫度、濕度狀況的測繪資料和科研報告，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

洛陽龍門石窟

龍門石窟（Longmen caves）也有北魏時代的風格，也是中國四大石窟群之一。位在洛陽市（Luoyang）之南 12 公里伊河兩岸的龍門山和香山山崖上，南北長一公里。現有洞窟 1352 個，佛龕 785 個，佛塔 39 座，造像 97,306 尊，題記和碑碣 3,680 塊。北朝與唐代所鑿的窟龕佔百分之九十。石窟大多利用天然溶洞稍加擴展而成，窟形簡單，平面多呈馬蹄形，個別的呈方形，窟頂也是略加雕飾的平頂，一反敦煌、雲崗石窟的中心柱窟、覆斗式天花和洞口柱廊的建法。

龍門石窟主要有古陽洞（Guyang cave）、賓陽洞（Binyang cave）、蓮花洞、火燒洞、石窟寺等。賓陽洞是開鑿時間最早、最精心富麗的石窟，其中第三層有兩幅大型的歷史畫卷式浮雕〈帝后禮佛圖〉，在 30 年代被盜走，現藏於美國紐約藝術博物館和波士頓博物館。

唐代所開鑿的奉先寺（Fengxian-si）盧舍那大佛，為唐代雄踞峰頂的代表作，完成於上元二年（西元 675 年）。此尊大佛高 17.4 公尺，頭部高 4 公尺，耳朵就長 1.9 公尺，雖然雙手及腿部有損，但仍具磅礴雄偉的氣勢。兩側為天王、力士、弟子及菩薩。

可是，佛像的面容秀麗豐滿圓潤，一雙秀目微微凝視，高直的鼻下是女性慈祥的微笑。據說是武則天的臉部翻版，武則天以薛懷義等著《大雲經疏》中之「女子承正，威服天下」的記載，她自視為佛，儼然以大日如來的報身君臨天下，所以就開鑿此像。

在龍門石窟的造像已逐漸脫離西域的風格，而獨自發展出中國的特色，此特色後來影響及韓、日兩國，成為漢傳佛教的一個系統。佛像的溫雅敦厚，其氣質已無胡人的粗獷，是東方民族的代表性創作。

天龍山石窟

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在太原市西南 40 公里處，原名方山因漢族北齊（Northern Qi dynasty）在此建有天龍寺，所以改稱天龍山。現有二十一個洞窟及其它小窟，分布於東西兩峰，其中東峰有 8 窟，西峰有 13 窟。從東魏、北齊以來仍有龍門石窟的餘緒，直到唐朝才因“曹衣出水”的流行，而顯出其特色。

石窟其中於北齊天保年間（西元 550-559 年）開鑿的石刻，都有十分寫實的建築形式表現出來。第一、十、十六窟窟前皆有三間窟檐，柱子為八角形，比例瘦長，柱根是覆蓮柱基，柱上托大斗，斗上橫施闌額，斗拱為一斗三升式，拱身卷殺，補間是人字拱，都是北朝的建築特色。

天龍山的唐雕身軀裸露、體格豐腴，筋肉表現柔軟富有彈性，體態優美，也給人豔麗的印象。有所謂“曹衣出水”的畫法，係北齊畫家曹仲達創造的一種人物線描法。《圖畫見聞集》記說：「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指出衣服貼身，似被水濕過一般，固稱為曹衣出水。天龍山石窟有不少刻畫精美的菩薩頭部像流落在國外，現存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盛唐時代菩薩頭部像，其髮髻高束，面部豐腴柔和，彎眉細眼，櫻桃小口，肌膚細膩富有彈性，是極為精美傑作。

炳靈寺石窟

甘肅炳靈寺石窟位於今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永靖縣城西南 35 公里處，開鑿在積石山黃河右岸的大寺溝內。炳靈寺是取藏語“仙巴炳靈”之“炳靈”兩音，原意為“十萬（彌勒）佛洲”，是明清時此地建有喇嘛廟後的命名，所以藏族同胞一直視此地是自己的寺院，有那樣的親切感。為唐代叫龍興寺，當時所開鑿的石窟，其塑像也是強調健康豐腴的美感，但也有其特點：臉形較長，頤豐唇厚，頸腰胯往往作明顯的轉折，動態比較誇張。雕刻刀法不像天龍山、龍門那般細膩，顯得有點粗獷勁力。菩薩的造型則是十分的世俗化，超過其他石窟。

炳靈寺石窟現有窟龕 183 個，石塑造像 694 尊，泥塑像 82 尊，壁畫 900 平方公尺，大型摩崖石刻 4 座。以第 169 窟西秦時的作品最古樸、敦厚。該窟北壁是其精粹所在，主要造像完成於永康、建弘年間（西元 412-428 年）。佛造像身後背光，繪有各種伎樂天，身上飄帶、披巾縈繞，有種飄飛之美。伎樂天形象與外緣的聯珠紋及火燄紋，構成了和諧的圖案。如此佛雕像與周圍壁畫結合的表現方法，是中國石窟雕像的一大特點，也呈現了五胡十六國時代西北地區的社會風貌，舞蹈、音樂與裝飾藝術，給今人最佳的參考價值。

唐代的造像與北魏時期有很大的區別，人物相貌不再是“秀骨清像”，有地方淳厚拙樸的特點，面型豐潤，下頷嘴角深陷，雙唇豐厚，神情自然寫實。而菩

薩之造型具女性化，體態一波三折，優美嫵媚。

○韓國（南韓與朝鮮）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韓國（Korea，高麗，Koryo 的轉音）處於中、日之間的“朝鮮半島”，西元 1953 年因戰爭而分為兩個國家，一是“北韓”（North Korea），領土面積有 120,538 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為 2,334.8 萬人；一是“南韓”（South Korea），領土面積有 99,274 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為 4,610.9 萬人。

據傳說在堯帝時，帝釋桓因的兒子下凡，與熊女生下檀君王，開始治理朝鮮，為「檀君朝鮮」時代，但因屬上古時代，故不足為信。可是北韓的國家主席金日成，居然在西元 1993 年，宣稱在平壤附近發現檀君的遺骨，為了只是對南韓顯示優越些；商朝時代朝鮮的北方就有遠夷肅慎；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Chosen，由「朝日鮮明之地」之意而來；或認為朝是東方，鮮是鮮卑族人之意。），始有君王；秦始皇統一天下，降服自稱是箕子後代的箕否，亦屬服於「秦朝」。

西元前五至二世紀，朝鮮半島上散佈著許多部落，北部是被中國統治的。漢高祖十二年（西元前 195 年），燕人衛滿率兵千餘名流亡朝鮮，消滅當時的「箕氏王朝」，成立「衛氏王朝」。漢武帝即位後，擴充疆土，出兵滅了衛滿的孫子右渠，將今日北韓地區的朝鮮部分納入漢朝版圖，分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漢人流行的陰陽、五行、圖讖、術數、風水、卜筮、神仙等信仰也開始流行於朝鮮半島。

古朝鮮大率為漢江以北之地稱之，漢江以南古稱“辰國”。西元前 37 年，漢元帝建昭二年，“弁韓”建立的「高句麗王朝」（Koguryo Empire）誕生，四世紀初葉，曾將北方的中國入侵者趕出朝鮮半島。在同一時期，西南部的“馬韓”建立百濟和東南部的“辰韓”建立新羅勢力增強，後來成為韓國的三國（Sanguk）時代，歷史上稱為「三韓」。

東晉義熙九年（西元 413 年），高句麗第二十長壽王陰謀百濟（Paekche），以求間諜。時有沙門道淋，應募入百濟，以碁見蓋鹵王，甚為親暱。道淋勸王大興土木，以致倉廩虛竭，人民窮困，國運日危。齊永明八年（西元 490 年），仁聖天皇三年，道淋還告之長壽王，王乃以兵三萬攻百濟，圍主都漢城，縱火焚城門。蓋鹵王出宮西走，為高麗人所殺，時為長壽王六十三年。

新羅國名之確定時，是在梁武帝天監二年（西元 503 年），智証王四年，因群臣奏曰：「始祖以來，國名未定，或稱“斯羅”，或稱“斯盧”，或言“新羅”，臣等以為，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義，則其為國號宜夷。」由是定名

“新羅”（Silla），時當梁天監二年，武烈天皇五年，可見當時韓國仍以中文為官方文字。

在隋朝以前，高麗句國的領地還達遼東半島以及長春一帶，到了七世紀中葉，新羅和唐朝聯袂征服了“百濟”（於西元 660 年）和“高句麗”（於西元 668 年），終於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初（西元 672 年），新羅控制了整個朝鮮半島。因為從唐朝傳入了許多文化，統一的新羅時代曾發出閃亮的光芒。為了鞏固王權的策略，新羅也大舉佛事，完成了紀念統一大業的四天王寺、感恩寺、甘山寺、望德寺等等佛教建築。可惜八世紀之後，又再度成三分局面，稱為後三國時代。後來由高句麗統一，於梁末帝貞明四年（西元 918 年）時，建立「高麗王朝」，此後高麗維持了 475 年的安定。

佛教建寺弘傳的開始

佛教初傳高句麗王朝和百濟王朝，均順利獲得王室的支持。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西元 372 年），氐族人稱帝於關中的前秦苻堅派特使及沙門順道，持經卷、佛像贈送給北邊的高句麗國第十七代君主小獸林王，是佛教傳入韓國（Korea）之始。越二年，東晉僧阿道又去高句麗，高句麗王在首都輯安附近的丸都城建了省門寺（肖門寺）由順道住持，同時也建了伊弗蘭寺由阿道住持，這是朝鮮半島佛寺建築之始。

佛教傳入朝鮮半島西南的百濟稍晚於高句麗。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西元 384 年），枕流王元年，梵僧摩羅難陀由東晉渡海到百濟的漢山城，受到百濟王的熱誠接待，諸王“以土木為神像，率百官祭之”，且“穿金以建珥堂，鑿玉以立寶塔”，翌年創佛寺於漢山，並度僧十人。此後“僧尼寺塔甚多”佛教在百濟泰安豐島的瑞山和唐津西海岸建有泰安摩崖伽藍、雲山摩崖伽藍、百濟金剛佛伽藍和修德寺等等。

四世紀時的百濟和日本的「飛鳥王朝」彼此間的文化交流十分頻繁，日本的文化受到百濟的首都“扶餘文化”（Buyeo）影響很深。而百濟聖明王遷都泗城後的「扶餘時期」（西元 538-660 年）是百濟佛教最興盛的時期，雖然“飛鳥文化”的母體就是由百濟發展成長的，可是日本的佛教是在西元 552 年，梁元帝承聖元年，當時佛教已經在百濟生根了一百六十八年後，才因百濟的聖明王勸進，而“公傳”入日本，後來也移民七千零五十三戶人口進入日本。

一般認為佛教傳入位於朝鮮半島東南的新羅，是在納祇王時（西元 417-418 年）由高句麗傳入的，這指的是「新羅王朝」正式支持佛教的開始，其實新羅佛教早先想由民間擴展，卻一再受到原始薩滿教（Shamanic）習俗的排斥，因此曾

經多次的殉教後，才獲得王室的承認。法興王十五年（西元 528 年），佛教經由官方同意傳入新羅自梁朝正式認可佛教。梁武帝太清三年（西元 549 年），梁武帝遣使沈瑚並新羅學僧覺德送佛之舍利至新羅，新羅真興王奉迎於京城之興輪寺。興輪寺是一座九層高的塔寺，從此新羅佛教便趨向旺盛。

南朝時陳文帝陳蒨熱心佛教的傳播，於天嘉六年（西元 565 年），遣使劉思及留學僧明觀送佛教經論 2700 餘卷，讓新羅的經籍臻於完備。我們發現南北朝時期約一百五十年間，新羅有很多著名的高僧到中國和印度求法，有玄光、明觀、無相、圓光、智明、安含、慈藏等人。圓光在陳末隋初來華求法，回國後大事宣傳佛教的“三皈五戒”，居然為了當時的爭戰國情需要，將五戒改為：「一、事君以忠；二、事親以孝；三、交友有信；四、臨戰無退；五、殺生有擇。」完全迎合君王的需要，居於護國主義故意做與中、印佛教不同的解釋。

而當時被稱為韓國「八宗之祖」的元曉，為了調和百家之爭，提倡“皈一心源說”以圖調和爭異，並對中國的各種教理進行科判，甚至譏笑天台智者大師的“五時八教”說是以「以螺酌海，用管窺天」。

韓國歷代帝王都相信弘傳佛教，會有一股神秘的力量，能夠庇護眾生，遠離災禍、瘟疫、疾病，使“北傳佛教”在朝鮮半島得到很好的沃土，但是以走入為“祈福佛教”。十世紀初，原是新羅王朝弓裔王（自稱為彌勒佛、Miruk-bosal）的摩下大臣王建被擁戴為王，建立「高麗王朝」，四百餘年歷代諸王都是篤信佛教，熱衷於佛事。高麗太祖以“護法者”自居，即位後即大興佛寺，後來在《宋史·高麗傳》有所謂“王城有佛寺七十區也”，可見當時佛寺之盛觀。太祖更禮待僧侶，開辦法會，使佛教隆盛異常，臨終時遺言強調要護持佛法。後來王室成員競相出家，甚至朝廷規定多子家庭必須送一子出家，推動了崇佛的高潮。

“高麗時代”則從宋朝吸取中國文化和制度，努力於改革。可惜，後來因為外有北方民族的入侵和倭寇的騷擾，內有官吏和僧侶的腐敗，源自「高麗王朝」長久奉佛，大興寺塔和名目眾多的佛事活動，卻只徒具形式，耗費國庫定也勞民傷財，加重人民的負擔，儒生因之起而反對。終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西元 1392 年），供讓王被其武臣李成桂所滅，「李朝」太祖統一全國，並改國名為朝鮮，開始了五百多年的李氏“朝鮮王朝”，歷史上通稱為「李朝」。

李朝歷代君王大都不支持佛教，甚至限制佛教、排斥佛教。朝鮮時代特定儒教為國教，太宗繼位後實行尊儒抑佛的措施，進行淘汰僧侶，限制寺院奴婢的數量，並且削減寺刹的總數等。佛教因此式微，但是佛教仍舊是當時平民的精神信仰。世宗時廢除僧錄司制度，強將諸宗併為禪、教兩宗。文宗時禁止百姓出家，規定僧尼不得進入都城，僧侶只能棲隱在山林中，這也就是韓國佛教學者所稱的

“山僧時代的佛教”時期。

十九世紀倭寇入侵，僧侶曾組義僧軍反抗，大量以身殉國，愛國的表現使得朝廷改變對僧人的看法，在光武元年(公元 1897 年)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同時也解除僧尼不得進城的禁令，佛教終於有了新興的機會。可惜西元年 1910 年朝鮮被併吞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次年日本總督頒布寺刹令，將朝鮮佛教分為 30 個本山，凡是住持、文物、字畫等等的處理，都要經過總督的批准，對朝鮮佛教做完全的控制，直到公元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可是緊接著卻爆發歷時三年的韓戰，而朝鮮分裂成南北對峙的兩個國家。

韓國佛教以華嚴宗為最大宗派

新羅統一時代到高麗時代，正是中國盛世，唐朝的建築、文學、美術、雕刻等文化直接移入，新羅是融合了高句麗和百濟文化，並積極接受大唐文化的傳遞，所以唐韓的佛教是相互呼應的，當時也是韓國佛教最興盛的時代，許多佛寺和佛像都是在此時興建的。韓國的“五教九山”也形成於當時，它們是：

一、“涅槃宗”：主要依據《涅槃經》經義所建立的。由新羅武烈王時期(西元 654-660 年，時當唐高宗永徽、景慶年間)的普德和尚開創的。“涅槃宗”有八大伽藍，根本道場是景福寺。對《涅槃經》研究有成就的是元曉、義湘、憬興、義寂、大賢，還有普德和尚高足無上、金趣等人。

二、“律宗”：由善得女王時代(西元 632-646 年在位，時當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慈藏創建於梁州通度寺(在慶尚南道梁山郡靈鷲山)，曾設“金剛戒壇”施戒。慈藏於西元 636 年率弟子僧實等入唐，在終南山雲際寺學南山律，回國後任大僧統，在芬皇寺(其址並塔現存慶州)開講《菩薩戒本》，修訂並整頓了朝鮮的僧尼戒律。

三、“華嚴宗”：以傳承中國華嚴宗系統的義湘大師屬“浮石宗”，在此時期開始有組織地發揚“新羅華嚴宗”，在他領導影響所及的寺院，以浮石寺、毘摩羅寺、海印寺、普願寺、玉泉寺、美理寺、梵魚寺、華嚴寺最有名。此系統的寺院，其大部分都沒有塔，或有塔也建在與主殿(金堂一無量壽殿)無關的位置。既然是弘傳華嚴宗，應該以毘盧遮那佛為主尊，但是義湘大師卻在浮石寺的金堂以阿彌陀佛替代毘盧遮那佛，而奉為主尊。“華嚴宗”另一派是元曉獨自創立的“海東宗”，以闡揚元曉的《華嚴經疏》、《大乘起信論》為宗旨，以《十門和諍論》調和百家的爭論。

四、“法相宗”：由真表律師於八世紀中葉在金山寺創建。承玄奘一圓測一道證一憬興一大賢的法統，傳印度唯識宗安慧系的學說。憬興作有《成唯識論易記》、《瑜伽論疏》，順憬作《成唯識論易料簡》等，使新羅“法相宗”奠定很好

的基礎。

五、“法性宗”：以弘揚《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為宗旨，闡述諸法實性之義。此三論思想始自晉朝入高句麗的順道、阿道及高句麗僧曇始傳播的。

另外有明朗建立的「神印宗」傳雜部密法；惠通建立的「總持宗」傳唐朝善無畏的印訣，以後更有明曉、惠日、慧超等人傳金剛智、不空的密法。

直至八世紀末，創建海印寺（西元 802 年創建）的順應大師與利貞大師到唐朝，跟隨神琳大師的弟子學到唐本新的《八十華嚴》與貞元本《四十華嚴》，返國後的新學僧，便將主尊改回為毘盧遮那佛像（中土稱盧舍那，盧遮那，流舍那，是法身佛毘盧遮那 Vairocana 的報身）當然也與唐朝密宗尊重毘盧遮那佛有關。早期新羅的佛教是具有思辨，為貴族所信的“教學佛教”。

到九世紀初，重實踐的禪宗在新羅興起，後來成為各朝佛教的主要力量。但是民間也開始流行稱唸阿彌陀佛西方淨土信仰、觀音（Guanyin）菩薩、地藏菩薩和彌勒如來的淨土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新羅王族金喬覺，於出家後在唐玄宗時渡海至安徽九華山，苦行修練，募化建寺，廣弘教法，使九華山成為地藏菩薩顯靈的著名道場。新羅還有一類“祈福佛教”是結合佛教的功德報應和道教的陰陽五行及地理風水的思想，使佛教深入一般民間，也增加了神秘性。（很像今天的台灣民間佛教信仰）

高麗時代佛教最大的宗派仍以“華嚴宗”為主。在均如大師（西元 923-937 年）、義天大師（西元 1055-1101 年）主導下，高麗華嚴宗不但繼承了新羅華嚴宗系的寺院，並在開京創建本山興王寺以及法王寺、開泰寺等寺院。高麗佛教多以講究頓悟修行，效法高僧舉止為主，並不重視佛像的膜拜。

高麗高宗十九年，蒙古士兵侵入，雖然焚毀幾十年才刻成的《高麗大藏經》的雕板。但在四年後的西元 1236 年，又傾盡國力重新雕刻，經十五年才再次刻成，雕板至今仍存在海印寺內。蒙古入侵時，又曾帶入密教，佛像的製作有過短暫的復甦現象，大多以塑造、木刻及金銅鑄造為主。後來因為鑄造技術的退化與材料的短缺，佛像呈現衰退的圖像化。

朝鮮時代的「李氏王朝」太祖李成桂曾受到高麗王朝崇佛的影響，對佛教採取扶植的政策，封僧人為國師，在宮中齋僧，舉辦法事，雕刻經板，並興建佛寺。可是繼位的太宗採以強烈的“興儒排佛”，並制定佛教宗團的統廢合法。此時原是華嚴宗系的浮石寺、海印寺、梵魚寺、華嚴寺等，骨子裡還是維持華嚴宗寺院

的特性，但金堂已改成大寂光殿或覺皇殿。

如早期的海印寺、華嚴寺等寺院，供奉三身佛像（法身毘盧遮那佛，報身盧舍那佛，化身釋迦牟尼佛），若金堂太小則僅供奉毘盧遮那佛一尊。但在朝鮮時代的大寺院則形成了一種複合式的安排，將大寂光殿和毘盧殿建在一起，所以有時候在大寂光殿裡也供奉三身佛像。

漢城（Seoul、Soul）唯一的佛寺是曹溪寺（Jogesa，刹、寺同音，其寺名發音均同閩南音），建於西元 1935 年，內有大韓佛教的“曹溪宗”總務處，成為現代韓國佛教的大本營。據說寺內有中國的梵鐘，此梵鐘本來放置在日本東本願寺別院，後來才搬到此地，惜今未能再見。韓國國內只有幾棵白松，曹溪寺內曾有一棵樹齡超過五百年的白松，因此十分珍貴，但也未再見。

雪岳山（Seolaksan）國家公園的雪岳洞附近有一座新羅時期的古刹神興寺（Sinheungsa），由慈藏法師於西元 653 年（新羅第二十八代真德女王時期）所建，原名香城寺，文武王時改名為禪定寺，但毀於朝鮮時代的戰火，直到西元 1644 年再度重建，並命名為神興寺。當時有一座奉祀佛陀舍利的九層石塔，目前因破損只剩下五層。寺中普濟樓內有距今 1400 年的大梵鐘，和一千多年前慈藏法師親刻的佛像。

從神興寺往北走約三公里的繼祖庵（Gejoem）是同時代所建的寺院。過去有東山、覺知、鳳頂三位祖師在此修道，之後為義湘、元曉繼承，由於其後更有傑出僧侶輩出，而得到繼祖庵之美名。

位於忠清南道修德車站以西 15 公里，有一座百濟末期所建的古刹修德寺（Sudeoksa）。寺中的大雄寶殿則建於高麗末期（西元 1308 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是韓國最古老最好的木造建築。修德寺是模仿典型的高麗寺院樣式而建，架構非常卓越，殿內的壁畫亦十分完美。

忠清南道首府大田市附近，有一座建於百濟時代（西元 724 年，唐玄宗開元十二年）的東鶴寺，這座古寺現在是韓國最大的尼僧學院。

東鶴寺以西雞龍山西麓的老松和山毛櫸森林中，有一座 1500 年歷史的古刹甲寺（Kapsa）。寺內有大雄寶殿、千佛殿、佛塔等十餘處建築，並且保存有鐵幢竿、月印釋譜版本佛經等珍貴的遺產。

忠清南道有七十多座寺院，而新羅時代所建的巨大古刹麻谷寺（Magoksa），是這些寺院的總寺廟。麻谷寺位於公州西北方 26 公里的茂盛山溪谷中，有「春

麻谷秋甲寺」的美譽。麻谷寺曾受到喇嘛教的影響，寺中於高麗末期所建的五層石塔，形式就比較特異，十分珍貴。靈山殿安奉著千佛像，也常令旅客詫異。

佛教傳到新羅後 24 年（西元 533 年），梁武帝中大通五年義信祖師從天竺攜回佛教經典，而建立了著名的法住寺（Beobjusa）。法住寺是韓國五大寺院之一，但是在壬辰之亂時幾乎全被焚毀，現在所見的是仿原形新建的，是聽來歷史久遠，建築物看來卻頗新的緣故。法住寺的大雄寶殿與無量寺（Muryangsa）、華嚴寺（Whaeomsa）的大殿並稱為韓國的三大佛殿。殿內的三尊佛像高 6 公尺，周圍 6.6 公尺，是韓國最大的佛像。

漢城南方 250 公里的全羅北道道廳所在地全州（Jeonju）西南 30 公里的母岳山西麓，有一座新羅時代（西元 766 年，唐代宗永泰二年）興建的名剎金山寺（Keumsansa）。寺中彌勒殿內的彌勒未來佛（Maitreya Bodhisattva）立像，高 11.8 公尺，是韓國最高大的塑像，彌勒殿因此也並列為國寶。

慶州（Kyeongju）是新羅國時代的千年古都，也是南韓最古老的都市。位在慶尚北道的南端，距釜山市（Pusan）以北 65 公里處，現在是韓國中東部的名勝地。慶州更是韓國人的心靈故鄉，每一個韓國人一生中未到慶州，會覺得很遺憾，所以有句話說：「不到慶州，不知新羅，等於沒有到韓國。」

慶州的歷史悠久，是韓國古蹟文物遺留最豐富的地方，韓國人稱慶州是「沒有圍牆的文化博物館」。慶州周邊區域有密集的王陵古墓外，還有海印寺通度寺（佛寶寺）、（法寶寺）、松廣寺（僧寶寺）、佛國寺、皇福寺、石窟庵、斷石山神仙寺，以及南山一帶的摩崖佛像等等，有著無數的佛教文化遺跡，還保存著許多文化財產，可想像慶州一帶更是新羅時期的佛國淨土。

位在慶州市東南的佛國寺（Bulguksa）座落在吐含山上，建於新羅二十三代法興王的時代（西元 535 年，梁大同元年），是為了母后的發願而建的（另說是宰相金大成為今生父母所建），並附建了人工挖掘出來的石窟庵。千餘年來經過數度修建，可惜在上世紀的韓戰期間不幸毀於戰火，戰後才又重建，如今共擁有七座僧堂，據說規模僅有原來的十分之一，仍然號稱是全韓國第一大且最精緻的建築。因此，佛國寺已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及文化遺產。

佛國寺最先徹底的被破壞是於“壬辰之亂”（西元 1592 年）時期，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時，燒毀大部分建築，除石造物之外，全被焚毀。而在「李朝」正祖（西元 1725-1776 年，時當清雍正、乾隆年間）時代再度重建，目前留存者計有無說殿、觀音殿、毘盧殿以及多寶塔和釋迦塔。佛國寺的多寶塔高 10.4 公尺，是純白花崗岩石塔，於新羅景德王時代建造。多寶塔外觀好似木造的，其優雅細

緻的程度少見，是新羅藝術的代表，屬於國寶級的文化財產；釋迦塔有三層，高 8.2 公尺，為韓國典型的三層石塔，沒有任何裝飾和雕刻，又名無影塔

（Muyeongtap），也是國寶級的文化財產；大雄殿左旁的極樂殿和毘盧殿，安置了國寶級的阿彌陀如來（高 1.66 公尺）和毘盧遮那佛（高 1.77 公尺）的座像，兩座都是以金銅製成，手法洗練，造形優美，是統一新羅時代留存至今的國寶。在佛國寺裡彷彿將法華世界、極樂世界、蓮華藏世界共組成一個新羅的佛國淨土。

距佛國寺約 3 公里的吐含山東側山腰，有號稱「東亞三大石窟」的石窟庵（Seokkulam），據說是宰相金大成為追念前生父母而建的。它本是石佛寺的附屬設施，由人工開鑿，窟內分為前室、通道、窟室。窟室圓形天花板下安置了高 3.43 公尺的釋迦牟尼佛降魔坐像，蓮花座是圓形的座臺，以純白花崗岩雕刻而成。佛像的手印、坐向、大小等，與玄奘法師在《大唐西域記》裡所詳述的釋迦佛成道處菩提迦耶大覺寺的佛像一模一樣。佛像莊重肅穆，有唐朝的風範，是韓國雕刻藝術中的傑作，更是韓國的國寶。石窟兩側有金剛力士及八部神將，孔武有力，威武雄猛。整座石窟地形險峻，朝東面海，是新羅人「依佛力攘敵」的鎮國寺院，有抵擋倭寇侵襲，並具有保衛疆土的用意。

韓國第三大城大邱市（Daegu）在釜山以北 117 公里處，而伽耶山國家公園就在大邱附近。伽耶山南麓的海印寺（Haeinsa）創建於“新羅時代”哀莊王三年（西元 802 年，唐德宗貞元十八年），由順應和利貞所興建。它與通度寺（Tongdosa）、松廣寺（Songkwangsa）並稱為韓國三大名（主）寺。但是也有據說是高麗王朝高宗時代，想用佛力防犯蒙古的侵襲，以拯救高麗，因而建造海印寺。

雕刻印行佛經，通常被認為有消災、祈福的妙處。韓國在高麗顯宗時（1010-1031 年）為擊退契丹的入侵，曾刻成《高麗舊藏經》，安奉於八公山符仁寺，後因蒙古入侵被全部燒毀。高宗時又在江華島重刻，歷經十六年完成，就是目前珍藏在海印寺的八萬《高麗大藏經》經版；另建於宋仁宗慶曆二年（西元 1042 年）的普賢寺，位於妙香山，風景秀麗，是朝鮮建築的藝術代表作，內亦藏有《大藏經》八萬冊。

海印寺寺內現藏有的八萬卷《高麗大藏經》，是宋理宗端平元年（西元 1236 年），高麗國王高宗因蒙古入侵，為祈求國泰民安，在江華島禪原寺開始製作大藏經版，總共花了十六年的時間，將經文刻在 81,258 枚的白樺版木上，以此功德祈求收復國土。這批「八萬高麗大藏經」是研究佛教經、律、論的重要文獻，日本也以此為底本，製作了《神守大藏經》，並且在七年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佛教傳到新羅之後不久，約在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西元 456 年），創建的直指寺，是南韓歷史最悠久的佛寺之一。據說阿道和尚指著黃岳山（Whangaksan）說，總有一天，這個山麓一定會有寺院建立，而因此命名為直指寺。

韓國唯一的禪寺梵魚寺（Beomeosa）和三大名寺之一的通度寺都位於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的附近。

梵魚寺位於金井山山腰，是“新羅文武王時代”（西元 678 年，唐高宗儀鳳三年）建立的，但於豐臣秀吉攻打朝鮮時焚毀，重建於西元 1613 年，明萬曆四十一年。梵魚寺有五百萬平方公尺，原有 360 多座的佛殿、僧院和庵，所以曾為韓國四大寺院之一。

通度寺在釜山以北三十公里處，是為了「通達萬法，普渡眾生」的理念建寺而命名。唐貞觀十九年（西元 645 年），新羅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時代，慈藏法師從唐朝攜回佛陀舍利拿到此地，因而建寺供奉。通度寺在明萬曆二十九年（西元 1601 年），毀於壬辰之亂，如今的規模是重建於西元 1941 年。通度寺有全國最大的 T 字型大雄寶殿及大小僧舍 35 座，規模宏偉。此外，寺中尚保存有 1300 多年前慈藏法師的袈裟。

○日本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日本（Japan）群島位於亞洲大陸的東北方，南北狹長的群島中，從南往北由四個大島：九州、四國、本州、北海道，以及數千個小島組成。領土面積有 377, 727 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為 12, 628. 1 萬人。由於緯度相差十五度之多，因此氣候相差明顯，變化亦多。漢武帝曾動用武力擴充版圖，在《漢書》〈東夷傳〉記載：「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帝）換以印信。」西元 1784 年，在南方博多灣的志賀島，曾掘得「漢倭奴國王」金印一顆，足以證明。

如今的「日本佛教」已經變化成不同於中國傳去的佛教，為了因應各個時代的需要，日本佛教一直在轉變中。中國佛教徒甚至露骨地說：「日本佛教是歪曲了中國佛教而墮落的佛教。」日本自己的學者也認為：“確實非常大膽地脫離傳統正軌，而看來有些許墮落”，純然是應付島國人民的期待使然。

南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西元 522 年），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南梁人司馬

達帶一族歸化日本，到大和國高市郡阪田原，結草堂供置佛像，禮拜甚恭，屬佛教「私傳」日本之始，當時日本人尚視佛為“他國神”，佛教是為“蕃教”；成書約於八世紀的《日本書記》說西元 552 年，南北朝梁元帝承聖元年，日本第二十九代欽明天皇十三年，佛教最初的「公傳」傳入日本，是百濟國的聖明王（宋蒙王，穆永王之子）遣西部姬氏達率怒隼斯致契等上表勸進。

百濟聖明王有感於佛法是「諸法中最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莫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福德，乃至成辦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逐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最主要的是強調信仰教義最出色的佛教，便會「有求必應，所欠無缺」。）並進獻金銅佛像、經論、幡蓋等，除了法隆寺的國寶百濟觀音（Paekche Kannon）外，還有飛鳥寺（前身是法興寺，後改稱元興寺）的遺蹟佛像，及廣隆寺的寶冠彌勒菩薩半跏思維像，完全是百濟的特色。如是佛教便以最新文化的色彩被傳入日本的。（另據奈良時代成書的《元興寺伽蘭緣起》則說佛教公傳到日本是在西元 538 年。）

可知日本的佛教寺院最早建立於欽明天皇“飛鳥時代”，是為了安奉百濟國獻貢而來的釋迦佛像，蘇我稻目把向原氏的私宅改成寺院，稱為向原寺，作為禮拜佛像並且祈願的場所。可是在敏達天皇十四年（西元 585 年，歲次乙巳）以前，日本疫病再度流行（可能隨百濟傳來的天花病），人民死亡甚眾，天皇亦病逝。被保守派臣子怪罪是佛是“瘟神”，佛教給日本帶來了災難，因此佛寺佛像被毀，出家人被禁，日本古代佛教史稱為“乙巳法難”。

隋文帝開皇六年（西元 586 年），日本用明天皇聽大臣蘇我馬子主張奉佛，仿效大陸國家之支持佛教流行，但仍受大連物部守屋和中臣勝海（世掌祭祀，主張仍應奉敬 Kami 國神）的反對。次年，天皇逝，大臣蘇我馬子聯合泊瀨部皇子、竹田皇子、廢戶皇子舉兵殺物部氏等保守派，擁立可能會信佛的泊瀨部皇子為崇峻天皇，可是崇峻天皇想擺脫蘇我家族的控制，傳曾蒐集軍備於宮中。卻被蘇我家族發覺，蘇我家族再度展開攻擊，殺掉崇峻天皇，擁立推古天皇（欽明天皇與其出身蘇我家族的皇后所生得女兒）繼位，從此蘇我氏專擅朝政。

在討伐戰爭困難時，廢戶皇子為祈禱勝利，許願建四天王寺。蘇我馬子也發誓說：「凡諸天王、大神王等助衛於我，使獲利益，願當奉為諸天與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寶。」於是在崇峻天皇元年時，蘇我氏請來朝鮮人，仿高句麗的清岩里廢寺格局建飛鳥寺（即法興寺，也稱元興寺，在今奈良高市郡日香町）。

而廢戶皇子（用明天皇二子，死後諡號“聖德太子” Shotoku Taishi，後世還盛傳他是南岳·慧思的轉世。）果然在攝津建四天王寺，把物部氏的奴隸分出

一半作為寺奴，分出其田宅作為寺的田庄。推古天皇繼位之元年（西元 593 年），聖德太子把四天王寺移建難波之荒陵。推古天皇二年，高句麗僧人惠慈、百濟僧人慧聰來日，受到聖德太子的敬信，並從惠慈學習了二十年的佛法。

日本從擔任推古天皇攝政王的聖德太子開始，便把大乘佛教置於治國、教民的指導地位，並且派“遣隋使”出國學習。從其所擬的「十七條憲法」中可見到提倡“篤敬三寶”的政策，而且佛教的因果報應思想在當時特別流行。當時天皇及貴族通過造寺、塑像、頌經等向佛菩薩祈禱功德利益。日本建寺的動機及精神，諸如聖德太子所建的四天王寺或是聖武天皇所建的國分寺，無不是為了降伏佛敵或鎮護國家為目的，也就是當作擁護國家的祈願寺而建立的。

除了“國寺”，其他公卿百官等所建立的私寺，也都是為了自己祈願成就而建立。日本佛教的興盛，首推聖德太子的大力提倡。隋大業三年（西元 607 年），聖德太子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到隋都，有沙門十餘人隨行。《隋書·東夷傳》記說：「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並沙門十人，來學佛法。」

又，具北魏式樣的法隆寺又名“法隆學問寺”始建於推古十五年（西元 623 年），是聖德太子為了紀念用明天皇而興建的。法隆寺曾於西元 670 年失火燒毀，其後再度重建，如今為日本現存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構造建築群。寺中的百濟觀音風格不同於日本的佛像造型，據學者考證是由唐地傳入，或邀請造像師親至日本造的。寺內供奉祈求聖德太子夫妻及其母后冥福的釋迦三尊像，還有金堂與五重塔，都是古物，值得一看。

日本一般把“推古天皇時代”稱為“飛鳥時代”，而把“大化革新”至遷都奈良之間稱為“白鳳時代”。“大化革新”以後，逐漸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屬“奈良時代”之前期（西元 645-710 年，時當唐太宗貞觀至唐睿宗景雲年間）的“白鳳文化藝術”是受到初唐的影響，稱為“唐樣”（Tang rules）。

天武天皇十三年（西元 685 年），命各地每家設佛龕，置佛像、佛經供養。此時期造寺、造像最多，以奈良現存的藥師寺東塔為最有名，是天武天皇為祈皇后病癒而建的。古舊的東塔為木造，現塔為重建，看起來是六層塔，其實只是三層而已，因為是每層各有堂階，富有律動產生的感覺。藥師寺中著名的「佛足石」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歷史，是遣唐使黃文本實從普光寺的佛足石臨摹出模型，帶回日本仿造的，以後日本才盛行製造佛足石。當時盛行講經，常講《金光明最勝王經》、《仁王般若經》、《維摩經》、《無量壽經》。

“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仿唐朝國家佛教的特色，也以佛教為國教，用來鞏固政體。“奈良時代”的佛教有所謂的「南都六宗」，即“三論宗”、“法相

宗”、“成實宗”、“俱舍宗”、“華嚴宗”和“律宗”。聖武天皇於天平十二年（西元 740 年，唐開元二十八年）發願，三年後開始在平城京（今之奈良 Nara）原金鐘寺的地方建國家大寺——“大倭國分金光明寺”（總國分寺）——東大寺（Todaiji），高 47 公尺，面寬 70 餘公尺，耗時十年才完成。

並且在各地方行政區設“國分寺”，有比丘住持的為「金光明四大天王護國之寺（國分僧寺）」；比丘尼住持的稱「法華滅罪之寺（國分尼寺）」。規定寺院每月八日必應轉讀《金光明最勝王經》，以祈四大天王之擁護，能得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國泰民安；每至月半誦戒羯磨。寺院經常得到來自天皇、政府和貴族的施捨，包括土地、封戶、奴婢及財物等等。

初期國分寺的建造並不順利，因為各地方政府在饑饉、疫病流行之後，財力不足，民力疲憊，進度緩慢。直到光仁天皇元年（西元 770 年，唐代宗大曆五年），建寺的基本工作才告結束。實際上很多不是新建，而是舊寺再利用或改建。奈良時代有元明、聖武、孝謙三位天皇出家。所以，這古都一千多年來雖然因為戰火的洗禮，如今仍保存有眾多的寺廟與神社，充滿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氛。目前所稱奈良古都的「南都七大寺」即東大寺、西大寺、大安寺（南大寺）、元興寺（極樂坊）、興福寺、藥師寺、法隆寺。

“國分寺”的建造都是淵源於中國，如元魏文成帝令諸州郡縣各建一寺；隋文帝仁壽元年至四年，下令諸州建舍利塔 111 所，盛行法儀為皇帝、皇室和臣民懺罪祈福；唐高宗時命天下諸州置寺觀各一所；武則天依《大雲經》做為“女主君臨”，令各州建“大雲寺”；唐中宗令各州建中興寺；唐玄宗令各州建開元寺。也是強調佛教有鎮國安邦的作用。

當然，仿唐的日本東大寺也安奉了毘盧遮那佛的報身像，大佛高十五公尺以上，用掉鑄銅七十三萬九千餘斤，黃金一萬四千餘兩，白銀一萬二千餘斤。孝謙天皇天平勝寶四年（西元 752 年，唐天寶十一年）落成時，由太上皇聖武天皇（藥師寺的景戒註解《日本靈異記》說他是勝德太子的轉世）率文武百官蒞臨親自主持。東大寺的完成是集合了南傳、北傳佛教之大成，鑄造大佛的行基和尚是百濟王的後裔；負責營建的國中連公麻呂是流亡日本的百濟人後代；執行開光的是南印度婆羅門僧菩提曇那；法會的咒願師是唐僧道璿；上奏佛樂的是越南占婆國的僧人佛哲負責。

西元 753 年，天平勝寶五年，被奉為日本律宗祖師的鑑真和尚到達日本九州。次年，鑑真到奈良，獻上經論佛像等，並為聖武太上天皇、皇后、太子授戒。西元 759 年，唐肅宗乾元二年，天平寶字三年，建唐招提寺，近代則成為律宗之總本山。

“奈良時代”後期的“天平文化藝術”是受到盛唐的影響，日本派出遣唐使帶回唐朝的文化，被吸收融入成“大和文化”然後保留下來。平安時期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和“真言宗”。「平安朝」弘仁十四年（西元 823 年，唐穆宗長慶三年）正月，嵯峨天皇把位在京都的東寺（空海亦曾為奈良東大寺的別當）賜給空海（774-835 年）作為密教真言宗的根本道場，空海把從唐朝帶回的佛舍利、曼荼羅、梵字真言、法具、論疏等都存放在此，後來仿唐長安青龍寺之例，天皇賜稱此寺為“教王護國寺”，因空海以東寺為傳法中心之故，稱為日本真言宗之“東密”。

此同時也賜比叡山一乘止觀院“延曆寺”之號。這時期為鑑真律師（688-763 年）所興建的唐招提寺的講堂，就是平城京部分宮殿所改建的。平安末年平重衡放火燒掉奈良東大寺等，到“鎌倉時期”由淨土宗僧重源擔任“勸進”，負責募財及組織工作，請來宋朝的工匠陳和卿設計，重新修建並重鑄大佛。重建的東大寺即採用宋代佛寺流行所謂的“天竺樣”，為現今世界上最大的木構造建築物。

恆武天皇即位，眼見政教弊害叢生，主要是各種政治社會及佛典的釋義產生信仰上的不同，甚至衝突。為了刷新政風，終於延曆十三年（西元 749 年，唐天寶八年）遷都平安京（今之京都 Kyoto），仿唐朝之長安城建造。進入「平安朝」以後，為了掃除宗教的弊端，下令禁止國師增員，並且嚴格選拔，任期六年。

唐貞元十一年（西元 795 年），更禁止官員、百姓將田宅、園地布施或出售給寺院，並改“國師”為“講師”，諸國各置一人。主要目的是採取必要的手段，以斷絕佛教與政治的關係，但是對純正的佛教發展則大加庇護，佛教新人物輩出，最有名的是開創天台宗的最澄大師和真言宗的空海大師。

“平安時代”（749-1192，時當唐天寶至宋紹熙年間）佛教的修行與一般庶民無緣，可以說只是貴族的佛教、陣護國家的佛教，這時期有平城、淳和、仁明天皇出家。而一般對日本佛教的分期，則以“平安時代”結束以前稱為“古代佛教”，而且是屬於祈禱的佛教。

日本的佛教為了與本土的神道融合，以減少其兩百多年來的長期的抗性。到了“奈良時代”末期便產生了「神佛習合、神悅佛法、神信佛法」的思想，認為無論神也好、佛也好，其本體是同一來源。神佛的分別，只不過是為了攝化眾生、救濟眾生的方便而顯現出來種種不同的形象罷了，神道信仰仍依附於佛教。所以，在觀念上認為只要依靠神佛間的冥合和扶助，就能使國家得到守護，皇室才能鞏固。為了配合這種思想，就在各處神社的境內蓋了佛堂或僧院，並由僧侶來司掌社務。

當時所建的國家大寺也稱“官的大寺”，因是歷代天皇和皇室成員的“敕願”建造的，也稱“御願寺”；屬於私人的寺院，稱為“定額寺”。為了讓日本的神祇擁護佛法，神也接受佛法的供養。在神社中興建佛寺，佛寺中也有神社，在“奈良時代”已經是很平常的地方信仰，這是“神宮寺”的源起。到了“平安時代”，又發展出“佛本神從”的「本地垂跡說」，認為佛是神的本源或本體，地方神是佛，為了度化日本而垂跡示現或應機權現，認定了許多神為大菩薩，如多度大菩薩、八幡大菩薩；伊勢宮的天照大神，更被認為是本地的大日如來。

於是神社內的僧人（別當、社僧）經常在神前讀經，舉行法會，佛教便深深紮根於民間，並且和當地社會習慣融成一體。後來更融合了神佛互習思想以及祖先崇拜思想，大量建造家族祈願的「氏寺」。以一般民眾為對象，讓庶民安奉祖先牌位的「菩提寺」或「香華寺」也在此期間出現，尤其“鎌倉時代”之後，出現天台宗的“山王神道”、真言宗的“兩部神道”，標誌「本地垂跡說」，越來越多主張神佛同體論、佛主神從說。如後來天皇也授德川家康為“東照大權現”之號，更分不清楚是什麼了。

日本的寺院以其祈願寺、神宮寺或菩提寺等不同的類別，所住僧侶的任務也各相異。其任務分成以祈願為主、以社務為主、以檀務為主等等不同。平安朝以後，大寺通常在堂塔伽藍之外，另蓋子院或私房，作為僧侶們的生活處，而形成了「複合寺院」的規模。

執掌神宮寺的僧侶乾脆把自己的住房當作生養子女的家庭住所，並讓親生子女能繼承寺院的住房以及個人的私財，如京都石清水八幡的護國寺、伊勢太神宮的法樂寺。其他以私財所建立的菩提寺，如醍醐之安東寺、日野的法界寺等寺院，是屬於「妻帶寺」。“室町時代”以後，則修驗道行者所住的寺院大多成為「妻帶寺」。這時期的佛教並未轉變為在家佛教，雖然仍保有出家的形勢，可是內涵卻已經完全的改變。

「平安朝」初期，受到唐文化的影響，漢文字和漢文學十分盛行，更是天台宗與真言宗弘傳的興盛期。佛教在日本更加興盛，信眾把自宅直接當寺院使用，俗家和佛寺也就非常的類接。當時到處更出現了貴族把住家的正廳改造為佛寺的情形。如嵯峨天皇把離宮改成嵯峨大覺寺；仁明天皇遷移清涼殿為嘉祥寺；清原夏野把自宅當作京都太秦的法金剛院；把醍醐天皇外祖父宮彌益的舊邸改為京都山科的勸修寺。同時有些貴族選擇山明水秀的勝地，興建寺院式的別莊，得以一方面過著俗家生活，又可兼顧出家式修行的生活。如金閣寺、銀閣寺無不都是兼顧出家、在家一體的寺院。

平安朝時代的佛教普遍密教化、貴族化，到藤原氏攝政以後，武士階層崛起，領主莊園制不斷發展，天皇形同虛設，從天皇到貴族都有惶惑感和危機感存在，每代天皇讓位後出家的更多，如清和、陽成、宇多、醍醐、朱雀、村上、圓融、花山、一條、三條、后一條、后朱雀、后三條、白河、鳥羽、崇德、后白河、后鳥羽等，其中白河天皇出家後稱“法皇”，設院繼續聽政掌權，鳥羽、后白河、后鳥羽也是如此。

日本淨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日本的遣唐史終止於“平安時代”寬平六年（西元 894 年），當時以唐朝末期動亂和海上不安為理由，終止了“遣唐史”之舉。平安中葉，武士思想抬頭，許多浪人寄生在佛寺，產生了“僧兵”，僧侶為了信仰的不同，佛寺以僧兵為前鋒，經常為爭權奪利而相互鬥爭。當時隨著僧兵作亂，而唐朝又有“會昌法難”，信徒以為人世的“末法時期”已經來到，而極思一個平和的淨土。尤其西元 1142 年，宋紹興十二年，康治元年，延曆寺、圓城寺的僧眾械鬥，圓城寺僧眾火燒延曆寺；西元 1163 年，金大定三年，長寬元年，延曆寺僧眾火燒圓城寺，更造成亂象及末法信仰的無奈。

佛教“公傳”入日本時，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思想和經典也逐漸傳入。北魏時期是以梵文意譯的「無量壽佛」稱號之，隋唐以後才以梵音的「阿彌陀佛」出現。故聖德太子死後，其妃橘夫人認為他“應生於天壽國之中”。後代的淨土信仰者則聯想認為“天壽國”即阿彌陀佛淨土早期在日本的稱號。其實日本淨土思想的興盛，則是在九世紀末的藤原時代以後，由於社會上充滿絕望與不安，並隨著對「末法」思想的焦急而到來的。

日本淨土信仰的興起和以後淨土宗的建立與天台宗有很密切的關係，天台宗的創始者智顛大師是提倡淨土信仰的，而“入唐八家”之一的最澄（767-822）將淨土信仰傳入日本。淨土思想原先是流行於中下階的平民層，然後逐漸擴及於上流的貴族社會，貴族一面唸佛求往生，一面沉緬於現世的物慾享受，社會上一度顯得頹敗極了。加上戰亂頻傳，對被壓迫的無知淳樸信眾，的確是一大福音，並且唸佛往生簡易方便，淨土的法門就越加興盛（光是執持名號的嘴“唸”，與現在部分的台灣佛教徒信仰情形有點類似），氣勢高漲到十分的狂熱。

淨土的法門大量宣傳認為只要一心“唸”佛，不管結婚食葷、無惡不作、多貪樂慾的一闍提（Icchantika，不相信佛法的人），完全依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就可往生極樂世界（類似“帶業往生”的宣導）。最澄的弟子圓仁（西元 794-864 年）入唐求法，曾到竹林寺，學到法照（生平不詳，被稱為善導後身。唐代宗永泰二年，西元 766 年，創“五會念佛法”）鼓吹的不斷「音樂性」「唸」佛式的

“五會念佛法”。

“五會念佛法”是受《大無量壽經》之啟發：“以清風時發五會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聞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轉至成佛道。”此法配上抑揚頓挫的五音曲調，按長短緩急不同的節拍頌唸誦“南無阿彌陀佛”，其“六時禮讚”亦伴之以哀婉動聽的曲調，產生感人（性）的氣氛，容易受到宮女們的喜愛。

圓仁回國後第二年，即承和十五年（西元 848 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在比叡山建常行三昧堂，作為修持法照的“五會念佛法”之所，也有不少僧尼皈依。如京都平等院的鳳凰堂，就極盡人智與財力，建造宛如極樂世界的豪華寶樓閣及寶池，讓建築物內外彷彿是極樂淨土。因此，遭致以正統佛教自居的南都（興福寺）北嶺（延曆寺）強烈的不滿，向朝廷奏請，禁止唸佛的舉止。

“鎌倉時期”（Kamakura period，1192-1333 年，時當宋紹熙至元順帝元統年間）、“室町時代”（1334-1568 年，時當元順帝元統至明穆宗隆慶年間）重要的有曹洞宗、臨濟宗，有些僧人為了打破舊有佛教的腐敗、混亂和日益脫離民眾的局面，提出有別於中國的新說，創立了新的宗派。對於“鎌倉時期”到“室町時代”是為日本的“中世佛教”期，也是武士幕府政權的時期。

鎌倉是日本的第一個幕府「鎌倉幕府」的發源地，也是佛教的重鎮。公元 1452 年，鎌倉民眾捐款興建了一座青銅阿彌陀佛的坐像，總高三十三點三五公尺，總重一百二十一噸，雖比東大寺的大佛略小了些，卻是現今戶外最大的大佛。

此時期有源空（號法然，1133-1212）創立“淨土宗”，後來其弟子親鸞（1173-1262）創立“淨土真宗”；一遍（1239-1289）創立“時宗”；日蓮（1222-1282）創立“日蓮宗”。

而這些創立人都未曾留學中國，把已在日本廣泛流傳的漢譯佛典和中國人的佛教著作，按照自己的理解，創立了新的宗派，這些宗派則具備了日本佛教鮮明的民族特色。此時期形成了天台宗的「山王神道」、真言宗的「兩部神道」，律宗的復興也產生了「南京律」與「北京律」，佛教更在統治者的支持下建立了「寺檀制度」，規定了寺院與信徒家庭間的隸屬關係。而親鸞則類似基督教的馬丁路德公然帶妻住寺，否定出家主義，其純粹以信仰為主的立場，對後來的日本民族佛教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淨土宗對於“無戒”之人，甚至說“惡人”唸佛也可以往生或成佛，是具備了深入人性的洞察力，有著令人很難脫離的魅力。果然被日蓮批判為邪法、惡法、

謗法，並說唸佛者會下地獄。日蓮把《法華經》(Lotus sutra) 信仰稱為正法，提倡口唸“南無妙法蓮華經”的唱題修行法。日蓮曾上書幕府用強力禁止淨土宗流行，書文寫說：「念佛是無間地獄，禪宗是天魔所為，真言是亡國惡法，律宗是國賊妄說。」當然招怒了四大派，在文永八年（西元 1271 年）被判斬罪，後減為流刑，流配佐渡。但三年後，自任為「上行菩薩」的日蓮再度獲赦而返回鎌倉，結廬於身延的山中，後建為久遠寺，成為法華信仰的中心道場。

由於天台宗寺院擁有僧兵，明穆宗隆慶五年（西元 1571 年），元龜二年，無法容忍寺院擁兵與政府對抗，織田信長（西元 1534-1582 年）攻入比叡山，將寺院焚毀。十年後又殺高野山僧眾 1383 人。明萬曆十三年（西元 1585 年），豐臣秀吉（西元 1536-1598 年）燒毀根來寺，又攻入高野山，威懾當地僧眾。

德川幕府於遷都江戶（今之東京 Tokyo）後的“江戶時代”（西元 1645 年，清順治二年以後）統治日本時則開始採取“鎖國政策”（直到西元 1853 年，清咸豐三年為止），禁止日本船隻出海貿易，禁止日本人與海外交往。原因是於西元 1637 年日本爆發了以天主教為主的島原農民起義，從此對宗教的限制也很嚴謹，為杜絕天主教的死灰復燃，將國民納入佛教組織中，建立了「寺檀制度」，讓寺院與檀家的關係制度化。僧侶具有“戶籍公證”的特權，國民的生死婚遷，都必須在寺院取得證明。其主要目的則是為了控制民眾，連日本學者就認為：那是“只用世俗權力無法完全貫徹其支配體制時，就利用宗教的力量。”當然寺院非常樂意執行這般政策。

於是佛教陷入安定保守、缺乏進取、思想遲滯的墮落情形，諸藩還曾實行“廢佛毀釋”的命令。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還政於明治天皇，明治元年（西元 1868 年，清同治七年），宣佈“神佛判離”令，宣誓文：「此次王政復古，基於神武創業之始，改為諸事一新，“祭政一致”之制度。」恢復任命神祇官，神社與佛寺分家，禁用佛語稱呼神號，禁供佛菩薩形像的神像，將長期的神佛分離開來，使神道成為國教，建立“神社制度”。明顯“神為本地”，佛只是“垂跡示現”。

在以天皇為首的極權統治體制之下，傳統佛教為迎合統治者的需要也提倡忠皇愛國，宣傳護國精神。日本真宗就有「王法為本」、禪宗有「興禪護國」、真言宗與天台宗有「鎮護國家」的觀念，產生不少僧人對天皇制度的效忠擁護，以及對外戰爭的支持，並且爭取了「僧侶參政權」。雖然在一片因戰爭利益而違背佛陀的教誨中，仍有少數反戰的僧侶或信徒，可是前者不是被逐出僧團，或最終被捕下獄。

日本佛教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政權到明治元年，歸為“近世佛教”；“明治維新”以後就是“近代佛教”。西元 1868 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後，日本便推行

“文明開化”政策，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改造日本。明治五年（西元 1872 年，同治十一年）四月，解除僧侶不得食肉、帶髮、娶妻的官制，下令僧侶使用俗姓，將僧侶世俗化、在家化，用以宣傳神政思想。最後卻變成佛神糾纏不清，佛教走向形式化，幾乎是麻痺的情形。

佛教諸宗見佛教陷入困境，於是紛紛派學者前往先進國家考察，並批評政府之不智，並展開「護法活動」。明治八年四月，政府停止“神佛合同”之說教。同年五月，解散大教院，允許宣說佛法各宗教義。明治二十二年，頒佈憲法，對信仰自由，賦與法律之規定。

日本近代以後，各宗在組織上以本山為首，政府把委任住持及制定“宗制”、“寺法”等權交給各宗“管長”。明治時期有十二個宗派流行，其簡況如下：

- （一）“法相宗”，以奈良的興福寺為本山。（崇信《唯識三十論頌》）
- （二）“華嚴宗”，以奈良的東大寺為本山。
- （三）“天台宗”，以比叡山的延曆寺為本山。
- （四）“真言宗”，以京都的東寺為本山。
- （五）“融通念佛宗”，以大阪的大念佛寺為總本山，下有四個中本山。
- （六）“淨土宗”，以京都的知恩寺為總本山，下有四大本山。淨土宗”西山派有四個總本山，“管長”輪流任職一年。
- （七）“臨濟宗”，有相國寺、建仁寺、南禪寺、妙心寺、天龍寺、建長寺、東福寺、大德寺、圓覺寺、永源寺十派，各設有“管長”。
- （八）“曹洞宗”，以福井縣的永平寺和石川縣的總持寺為兩大本山，設有兩位“貫首”，以一年為期輪流主持“管長”之職。
- （九）“真宗”，有本愿寺派、大谷派（東本愿寺派）、高田派、佛光寺派、興正寺派、錦織寺派、毫攝寺派及專照寺、誠照寺、証誠寺三門徒派，共十派各設有“管長”。
- （十）“日蓮宗”，以山梨縣身延山久遠寺為總本山。下又分十派，各設有“管長”。
- （十一）“時宗”，以藤澤的清淨光寺（游行寺）為本山，今尚存七派。
- （十二）“黃檗宗”，以京都宇治的萬福寺為本山。

西元 1905 年才從“真言宗”獨立出來的“律宗”，則以奈良的唐招提寺為本山。因此，近代日本佛教共有十三宗。目前則有七大系（淨土、禪、真言、天台、日蓮及其他），內含 270 個宗派。

仿照中國洛陽城而建的京都，也稱為洛陽。建於西元 798 年，唐貞元十四年，位於京都東山境內的清水寺，因為寺中擁有一處清泉而得名，但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正殿，整座建築構造都沒有使用到一根釘子，寺前的木質陽台就建在斷崖之

上，以數十公尺的長木將平台懸空支撐著，故以「清水舞台」聞名於世。

京都有許多著名的寺廟，如三十三間堂、延曆寺、東本院寺、西本院寺、東寺、萬福寺。延曆寺是天台宗的總本山；東寺是真言宗的總本山；萬福寺是黃檗宗的總本山

千年古都京都的金閣寺與銀閣寺也頗負盛名。曾經出現在三島由紀夫筆下的金閣寺（舍利殿），是足利義滿將軍所建，雖然才只有五百多年的歷史，卻因此與日本的富士山（Mt. Fuji）和藝妓並列為日本的典型代表。金閣寺樓身貼有金箔，樣式融合「唐樣」、「武家」、「寢殿」三種風格，覆蓋著寶塔塔剎屋頂，剎上裝飾有鳳凰。金閣寺前的「鏡湖池」是最佳的賞楓地點，這裡屬於池泉迴遊式的經典庭園，池畔種有許多楓樹，常做為獵取金光閃亮的金閣寺的最佳背景；銀閣寺最有名的是枯山水庭園，以及象徵中國西湖的「銀沙灘」。庭園中央的「向月台」是白砂堆成圓錐形的小山丘，可以反射月光。還有一條兩公里長的「哲學之道」，因為昔日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經常在此散步、思考，是京都最適合散步的道路。

○雲南及古代南詔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現在的雲南省住著二十六種民族，其中有中國古代西北一帶遷移而來的的羌、氐族人，這些族人原居陝西、甘肅、青海、西康、四川、西藏一帶，後來南遷到雲南，以至於緬甸。吐蕃人及南詔國人就是屬於這個種族的，雲南古代的爨族（東爨是彝族）也就是“羌族”南移者。

而“詔”字是古代“氐”族稱“王”之詞，《晉書·前秦苻堅載記》：「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新唐書》之〈南詔傳〉說其為「哀牢夷之後，烏蠻別種」，“烏蠻”即今之烏爨族，以裸羅為代表。氐、羌族移居雲南一帶，與操藏緬語的“彝族”和“白族”共融，所形成的南詔語言，就是唐代洱海地區的白蠻語和烏蠻語。

西元七世紀中葉，於今雲南的蒙舍詔本來是烏蠻六詔之一，位處最南邊的巍山，故稱為南詔。在細奴羅（西元 649-674 年在位）的領導下開始壯大其勢力。唐調露二年（西元 680 年），吐蕃向南擴張勢力，南詔國部分地區一度臣服於吐蕃，經歷吐蕃奴隸主 114 年的統治。

開元十八年（西元 730 年），皮邏閣（老撾人稱為坤博隆）在唐朝的支持下，兼併五詔（蒙雋詔、越析詔、浪穹詔、遼詔、施浪詔），滅道明國，統一洱海地區，自稱“南詔王”，成立以大理地區為中心的“南詔大蒙國”。南詔與其餘五詔族人的命名，都是「父子聯名制」，細奴羅生羅盛，羅盛生盛羅皮，盛羅皮生皮羅閣，唐朝曾賜皮羅閣名為歸義。唐天寶十一年（西元 752 年），南詔王閣羅風叛唐，並將唐朝勢力逐出雲南，轉而歸附吐蕃，接受吐蕃冊封為“贊普鍾南國大詔”，兩者交好有四十二年，“藏傳佛教”也於此期間進入南詔。貞元十年（西元 794 年），又轉而連唐反吐蕃，奪取了神川都督地和昆明城。又南征茫蠻、黑齒等部落，拓併土南與泰國南奔一帶的女王國接壤。

於八世紀中至九世紀末，南詔國勢強盛，版圖北抵大渡河，與唐朝以一水之隔；西北與吐蕃為鄰；東至今之貴州遵義和廣西西部。老撾、越南、泰國與緬甸四國的北部，都曾被南詔征服，是當時中土西南邊的一個大國，而且時時侵犯邊境，為唐朝的心腹大患。目前位在昆明城西的圓通寺，就是南詔國興盛期所建。圓通寺原名補陀羅寺，曾毀於兵燹，元大德五年（公元 1301 年）重新整建。明清兩朝亦進行不同規模的修葺，但目前所見的大都是清式建築。

唐朝入南詔的路線主要有“通安南道”、“通西川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唐文宗太和三年（西元 829 年），南詔國入侵成都，掠走匠人數萬，從此南詔手工藝技術不輸蜀中。唐昭宗天復二年（西元 902 年）權臣鄭氏弒殺南詔王舜化貞，成立“大長和國”，南詔亡國。但此後三十多年，內部鬥爭劇烈，前後分別成立有天興國、義寧國。直到後晉天福元年（西元 937 年），白蠻貴族段思平篡位取得政權，建“大理國”（西元 937-1094 年，時當後晉天福至宋哲宗紹聖年間），後裔改為“後理國”（西元 1096-1253 年，時當宋哲宗紹聖至宋寶祐年間），均曾自外於遼宋，為雲南地區之一大國家。元代時大理國地區被劃入版圖，設置有雲南行省轄區，於是取代了大理國。

“大理國”段氏採取閉關自守，不求大作為，唯獨在信仰佛教上唯誠唯敬，百姓柔順，樂善好施，敬奉三寶是當時社會的風氣。因此古人說：「大理（葉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鐘鳴；伽蘭殿閣三千堂，般若宮室八百處。」

談南詔國佛教，應該也談及今天的雲南佛教狀況，雲南自古有「妙香佛國」的美稱，據說佛教約於西元七世紀時，傳入位居中國西南的雲南地區，佛教弘傳十分興盛，其四大宗派齊全，可分“梵文經典系”的佛教（阿吒力教，即阿嵯耶教、阿闍黎教，屬印度密宗，稱為“滇密”）、“漢文經典系”的佛教（漢傳佛教，屬“唐密”或稱“漢密”）、“巴利文經典系”的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藏文經典系”的佛教（藏傳佛教，屬“藏密”），這是很特殊的現象。

南詔的領域曾達今日緬甸的北部一帶，據說最早進入南詔的佛教是“阿吒力教”，唐穆宗年間（西元 821-824 年），中印度阿闍黎師（Acarya，音為阿吒力，即規範師或導師）贊陀崛多（一作室利達多）由摩竭陀路經當時緬甸的驃國到達南詔，傳播“阿吒力教”，受到南詔王細奴邏的崇敬，而尊為國師，並在鶴慶建元化寺，開五密壇場，施行密法。

此時期正是大乘佛教與印度教相結合時期的第二階段，為“中期正純密”，或稱“左道密教”，崇拜大神摩訶迦羅（Mahakala 大黑天，在印度教是濕婆神的別名，為濕婆再破壞世界時的黑暗形相，藏傳佛教也崇奉此尊），有高度組織化的咒術、儀軌，推崇儒教，兼融巫術，並融合了南詔的風俗、習俗，成為“阿吒力教”，適應雲南的自然崇拜，為民眾祈雨禳災，發揮密法咒術的威力。他的弟子張子辰、羅邏倚等也由西印度到南詔，相繼傳佈“阿吒力教”，時稱「南詔七師」，即七位灌頂國師。直到近世“阿吒力教”仍傳承不絕。

元代元統甲戌年（西元 1334 年）所立的《故正直恭謙和尚墓碑銘並序》刻有：「南詔歸義王皮羅革之嫡男蒙閣皮，厭俗而薙。于時公卿子弟洎士民之俊秀，從之遊者以千數，咸曰：王子仁人也！同日 □□ 五百餘人，舉國追慕不已。詔曰：乾竺婆羅門僧，求佛而在家者。遂命以世祿，尚以貴屬，號“師僧上首李畔富和尚”。戒行拔萃，為世宗匠，神功道尊，播在人口。」甚至建國三百多年間，歷經二十二位的君王，就有十位出家為僧。也因為帝王的出家，佛寺自有雄厚的文化實力，於是僧人都受到民眾的尊敬，傣語也稱僧人為“康朗”，就是知識份子的意思。

“求佛而在家者”就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在家阿吒力，可以傳授後代，代不乏人。“師僧”即阿吒力軌範師、灌頂師。“上首”就是“首座”。也正因為阿吒力教是通過父子相傳，兄弟相傳，不著文字，具有極大的秘密性，這是“滇密”的特徵之一。

“阿吒力教”主要的經典是《金剛頂經》、《大日經》、《蘇悉地經》。“阿吒力教”供奉的本尊之一是大自在天化身的“大黑天”神（Mahakala，摩訶迦羅），卻又是“唐密”和“藏密”熟悉的護法神之一，特別對大理、昆明地區彝族、白族、漢族佛教徒有很好親切感，所以流傳“大黑天”神的神話也很多。

元代時“漢傳佛教”在雲南地區發展順利，對“阿吒力教”產生排擠和融合，統治者甚至將“阿吒力教”視為邪教、“土僧”，迫使“阿吒力教”進入農村，但是“國滅教不滅”，最終演變成為雲南地區的地方民族宗教，一種沒有固定寺院，只在家中設壇作法事的民間風俗信仰。但明朝時還專設「阿吒力僧剛

司」與以統理。

不過，根據《續修馬龍縣誌》記載，縣東四十里龍鼎寺，「相傳建自蜀漢，古剎中最久遠」。《大理縣誌稿》記載，大理宏聖寺「相傳為周阿育王建」；感通寺「東漢時建」。《南詔野史》有謂：南詔蒙氏為阿育王後裔，其實只是“君權神授”的玩弄手法，因蒙氏王室崇信佛教，便偽托為阿育王的後裔，用以取得民眾的虔信。正如羌族後裔的吐蕃貴族，也宣稱是印度王子之後，都是應宗教需要的謊言，與歷史事實根本違背。

《永昌府誌》記載，保山縣北三十五里臥佛寺，「建自漢時」。東漢時大理為永昌郡葉榆縣，保山為永昌郡治所不韋縣，馬龍為益州郡同瀨縣。漢時川蜀往身毒道起至蜀郡（成都），中途經雋郡（西昌）、益州郡（滇池東南）或永昌郡（保山），南下進入緬甸，西至身毒。馬龍龍鼎寺在滇池東北，大理宏聖寺在洱海西岸，保山臥佛寺在入緬之要衝上，這些寺都在蜀地往身毒道上。滇池、洱海為宜農地區，又處於進入富庶的蜀中的滇緬古道途徑，方誌說這些古寺創建於東漢蜀漢之際，似有可能，則雲南佛教的傳入，早在西元三世紀以前。

目前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及比鄰西藏芒康等地，藏族居民盛行“藏傳佛教”中的黃、紅、白派教派，還有古老的黑本“倉巴教”和白本“頓巴教”；麗江縣及維西一帶的納西族是信仰“藏傳佛教”的噶舉派（白教）黑帽派和紅帽派；寧蒗縣永寧及瀘沽湖地區的摩梭人和普米族人信仰黃、白教為主，信花教的較少。原來土著信仰的宗教如納西族的“東巴教”（“東巴”就是祭師）、摩梭人的“達巴教”、普米族的“汗歸教”都被藏傳佛教化，土主神、地方山神、湖神、泉水神也都被“藏傳佛教”所吸收，所以現在雲南的“藏傳佛教”有當地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但也可以反過來說，是“東巴教”學了“藏傳佛教”，才保存了現今的特色。

雲南的“藏傳佛教”與當地的土司有密切的關係，但當時尚未形成「政教合一」，而一直是相互依存的現象。寺廟沒有太多的土地，沒有農奴，上層僧侶的財產及權勢也很有限。僧侶不擔任土司政權下的官吏，所以保持著“政教分離，教不參政”的特色。

元代至元十七年（西元 1280 年），元西台御史郭松年巡行雲南三年，在《大理行記》寫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葷飲酒，至齋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殫記。」

明代謝肇淛在《滇略》卷四說：「葉榆（大理）以西接天竺國，故自唐宋以

來，崇奉釋教，日甚一日。朔望則裹飯袖香，入寺禮佛飯僧。俗云：信三寶家，永為和合。」述律杰《重修大勝寺碑》記說：「古滇居民慕善，齋潔茹苦食淡，手捻菩提珠，口誦阿彌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連西竺，與佛國通，理勢然也。」又有袁嘉谷在《滇南釋教論》中盛讚大理國佛教：「真佛化之妙境，盤盤數千里，悠悠數百年。娑婆界中坤輿廣大，歷史陳述未見有實行佛化如此之深且久者也。」

大理由於佛教興盛，佛教建築及造像藝術甚為發達。白族的寺廟建築與民居關係密切，寺廟之立面外觀、裝飾和平面佈局多與民居相似。因有此特殊的地方美感，故在《雲南通志》中記說白族的建築物成顯出：「恬淡清習，肅然寂然之境，有以消人勢利之心。故達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托而逃匿。」

大理地區的佛教寺院配置，與中土傳統相同，中軸線多採南北坐向，置山門、前殿、正殿、法堂，或再加藏經閣，東西兩側為配殿（安排有伽藍殿、三聖殿、藥師殿、彌勒殿、觀音殿、韋陀殿、金剛殿、開山堂、祖師堂等），僧房、齋堂、方丈室、香積廚、職事室、茶堂安置在左側；朝山香眾之客堂、雲會堂則在右側。

大理最完整的中原傳統佛寺，現存僅有的是位於賓川縣西北五十餘公里雞足山的祝聖寺，其規模宏大。該寺在三國蜀漢時便建有小庵，從唐至明代則發展成以寂光寺為主的八大寺、七十一叢林。清光緒年間，更擴展以祝聖寺為中心的三十六寺。文革浩劫讓名山幾乎不存，直到公元 1979 年才陸續整修，新建之迦葉殿、觀音殿，建築裝修都已白族化，墨彩敷色、門窗雕刻材料均為民居風格。

雲南信仰南傳“上座部佛教”的地區，居住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的佤族，幾乎“村村有佛寺”。佛寺的規模為大殿、僧舍、鼓房三部分，如果是“中心佛寺”以上的佛寺都設有布薩堂（誦戒堂）和藏經閣，較大的佛寺便建有佛舍利塔（或高僧骨灰及遺物塔）。“上座部佛教”和地方原始宗教的密切融合關係，可從佛寺大殿兩側或前面通常建有“底布拉”的神龕看出，“底布拉”神是一種靈魂轉化的觀念性神，是作為專供保護佛寺的神靈用的。

在雲南不論是群眾的信仰或某種其他的儀式，都與原始宗教的神靈崇拜結合在一起，這種寬容性也一直是雲南佛教的特色，而且“上座部佛教”還保存有“婆羅門教”的繁瑣禮儀。通常“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大殿都只供奉一尊釋迦牟尼佛的塑像。西元 1569 年，召片領刀應孟娶緬甸金蓮公主為妻，公主即在景洪興建緬寺，緬寺從此大興。“上座部佛教”進入雲南後，在德宏地區的緬寺建有佛殿、潑水亭、僧舍和塔，受到漢文化的信眾需求，佛殿還加供觀音菩薩像；西雙版納地區，佛寺裡建有佛殿、經堂、僧舍和塔，也允許供奉女性的“水井神”塑像。

“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建築形式，大概可分為宮殿式、干欄式、干欄宮殿混合式三種形式。宮殿式佛寺一般建有大殿、僧舍、鼓房、圍牆、山門；干欄式的建築如民間的竹樓形式，較為簡陋，大殿為一樓一底的兩層建築，殿堂設在上層，附設僧舍；干欄宮殿混合式的佛寺，呈現兩者的特點，大殿也是上下層，下層中空，上層的殿堂內部陳設與宮殿式相同。傣族的寺院有佛殿、潑水亭、僧舍等，屋頂大多高聳，採用“歇山式”，在大面積的屋面上分作高低三段或五段處理，打破大屋頂的呆板形象，並在各條屋脊上成排布置火燄狀和各種獸狀的莊飾，讓屋頂充滿著豐富的氣氛。

迪慶州藏族寺院中的僧舍，一般都是依照當地民居的形式建造。如中甸和德欽等地多為“土掌式房”形式，維西等地則多為“干欄式”建築。寺院中的大殿等主體結構，基本上是傳統“碉房式”建築形式；摩梭人、納西族和普米族藏傳佛教寺院的建築，主體結構都保持著藏族的風格，但不同於藏族地區“碉房式”建築，而與漢族、白族地區的廟宇建築形式相似，採用土木磚建造，更因受到漢族、白族、納西族建築藝術的影響，故體現出多民族的融合特典。在雲南地區的寺院，有著多種文化交融的風格，各具特色，因此也證明無法定義什麼是佛教建築。

“藏傳佛教”寺院在雲南藏族境內地區現有 24 座，其中屬於黃教格魯派的有 13 座，白教有 7 座，紅教有 4 座。本章僅擇代表性介紹如下：

黃教格魯派的“噶丹松贊林”是五世達賴賜名的，為藏族區“十三林”之一，後經清帝雍正定漢名為“歸化寺”，建於清康熙十八年（西元 1679 年）。位於雲南中甸縣城北四公里的歸化寺，座落在佛屏山山麓，全寺仿拉薩布達拉宮的布局，沿坡層疊而上，佔地約 33 萬平方公尺，“扎倉”和“吉康”兩主寺聳立於高阜中央，八大“康村”（僧侶基層組織，學經之處）和“覺廈”、“西蘇”兩個事務機構及活佛的靜室和數百間僧舍分布其間，成為藏式碉城式的建築群，城垣設有瞭望台、哨樓、碉堡以御盜匪，有如一座莊園城堡。

歸化寺的主寺“扎倉”（佛學院）坐北向南，是五層建的藏式碉房建築，為石木結構，屋頂覆鍍金銅瓦，殿宇屋角有獸吻飛檐，是漢藏混合的造型。而寺中碉桶內壁廊的屏門、花窗，其雕刻藝術的技巧和表現方式，有著濃厚的白族與納西族的建築藝術特色。

始建於清雍正七年（西元 1745 年）的壽國寺，位在維西縣康普鄉岔枝行政村駐地西北的喇嘛寺自然村，因地名又被稱為康普寺。先是為了擁護清朝首次派流官治理該縣而取名壽國的，寺的藏名為“達吉林”。因被火焚毀，遷到現址重建於乾隆三十五年（西元 1770 年）。主殿以漢族建築風格為主體，容納了藏族藝

術特色，由山門、正殿、側殿組成一座四合院，佔地 2600 平方公尺。正殿以三重檐樑尖頂覆蓋，殿內供奉釋迦牟尼佛、大寶法王和二寶法王，以及蓮花生大士像。

上世紀的電影名片“失落的地平線”中提及的“香格里拉”，據說就在雲南省西北角落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盛產黃金的丙中洛區，它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駝峰航線”經過的航線下。丙中洛鄉的標標人說「以後再來」為“下格里拉”，藏語發音“甲格里拉”是說「佛教聖地」的意思，所以那裡有一座“普化寺”，可能就是電影中所描述的“香巴拉宮”。普化寺建於清乾隆三十一年（西元 1766 年），由白教的松婁喇嘛所興建，原稱“飛來寺”。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去參訪，好圓一下影片中那誘人的美夢。

○越南國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梁書》卷五十四〈諸夷列傳〉四十八敘言說：「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今之中圻）。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羅馬）、天竺（身毒），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改蓋渺，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傳云。」

安南就是現在的“越南”（Vietnam）。“安南”（An Nam）原名“交趾”（Giao Chi，今之北圻），很早稱為“文郎國”（Van Lang），是由「鴻龐王朝」（Hung dynasty）所建立的國家，又叫“交州”，秦時屬“象郡”（今河內 Hanoi）。秦始皇前後發了百萬士卒征伐南越（Nam Viet），必定有不少人流落這些地區。越族是中國南方的古老民族，居住在東南沿海和珠江流域一代，過著農耕和漁獵的生活。秦代伐越同時，也移徙了很多人使與百粵雜處，我們可以了解從秦漢以後，漢、越民族的血統是相互混雜的。秦末南海郡尉趙佗（Trieu Da，Chao Tuo）獲知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為防盜兵，聚兵自守，秦滅後，擊併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漢高祖定天下後，嘉許趙佗為中國勞苦功高，於十一年（西元前 196 年）派遣陸賈立趙佗為南越王，正式又統領“南越”或“南粵”（越、粵兩字是相通

的)，領地為原南海（廣州）、桂林、及象郡。所以，至漢初時的“南服”又是為三個越族所建立的國家，即東甌（浙江永嘉）、閩越和南越。可見自古以來浙江、福建和廣東一帶，漢、越民族血統交流混雜已經很長久了，其源遠流長，實同一體。

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 111 年），派伏波將軍路博德為征討“南越”叛相呂嘉，領大軍平定“百越”（Bach Viet），將之納為版圖，名為“交趾”部，下置南海、蒼梧、鬱林、河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交趾（今河內）、九真（今義安）、日南（今廣治）屬今之越南領土。

三國時代，吳國境內的山越曾與漢族共同開發了江南，越族人學到了漢族文化，而且漢人文化在此後影響交趾有一千年之久。直至，西元 820 年，唐憲宗元和十五年所繪製的〈方陣圖說〉中，尚設有安南（交州）都護府，管轄越南。唐末、五代十國以後，中原地區戰亂分起，越南吳朝興起，就脫離與中國的關係，自成一國。

古代越南中部的占婆王國（Champa）並不是“越南族”人的國家，而是由擁有馬來——玻里尼西亞傳統，以及印度教文明的“占婆族”所建立的國家。不過，現在的“占婆族”僅剩下數萬人，已成為越南的少數民族。西元 192 年，正當漢朝政權瓦解之時，有“林邑”（古占婆國，即安南中圻）在扶南的幫助下建立帝國，其所佔領土地，原為漢朝的象郡象林縣，後來逐漸擴充到今之順化（Hueh）一帶，即今越南橫山以南的中部和南部地區。以林邑作為扶南與漢朝間的緩衝地帶，所以，有可能越南當時曾從已印度化的扶南傳入佛教與“婆羅門教”（Brahman，梵），兩種宗教並立，也常常混合。在寧順有碑文，記載一大臣，既建佛寺以祈福，又建大自在天王祠以積善。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元 446 年），宋元嘉二十二年，林邑侵犯中國邊境，宋交州刺史檀和之領兵進討，佔領林邑京城榮驕，並將林邑置郡納入版圖。到了六世紀，占婆王國便脫離中國的統治，有了繁榮昌盛的時期。八世紀爪哇國曾侵略占婆，但是沒有成功。

西元 1145 年，高棉人征服占婆王國，但兩年後，一位新的占族王起而推翻高棉人，他的繼承人則揮軍入侵柬埔寨的吳哥。從十三世紀開始，占婆王國分別與高棉人、越南人、蒙古人展開戰爭。到了十五世紀，占婆王國終於瓦解，十七世紀時遭越南人合併，南圻就併入越南，越南文化從此便往南發展。

唐朝末年，也就是西元 938 年，越南「吳氏王朝」（Ngo dynasty, 939-967）的吳權（Ngo Quyen）在白藤江（Bach Dang river）殲滅中國南漢的大艦隊，才

如願脫離，不再為漢族的藩屬。西元 939 年，越南獨立成為「大越帝國」(Dai Viet)，可惜吳權死後，國家陷入混亂局面。後來雖有勢力強大的諸侯丁部領(Dinh Bo Linh)擊敗其他諸侯，建立大瞿越國(Dai Co Viet, 968-979)自立為丁先皇帝(Dinh Tien Hoang De, 發音與閩南音同)，可是仍然被侍衛刺殺而亡國。接著是黎桓自立為黎大行(Le Dai Hanh)皇帝，稱為前黎朝(Tien Le dynasty, 980-1009)，但卻維持不久。

西元 1009 年開始，越南(Vietnam)出現三個大王朝——「李朝」(Ly dynasty, 西元 1009-1225 年，時當宋真宗大中祥符至宋理宗寶慶年間)、「陳朝」(Tran dynasty, 西元 1225-1400 年，時當宋理宗寶慶至明惠帝建文年間)、「後黎朝」(Le dynasty 西元 1428-1787 年，時當明宣宗宣德至清乾隆年間)。

西元 1437 年，明朝冊封黎季犛之子黎太宗(Le Thai Tong)元龍為安南國王，自此越南從中國藩屬獨立出來。越南安南國在這三大王朝的治理下維持了七百年的安定局面，雖說是獨立，卻也繼續對中國稱臣入貢。但是與中國仍有干戈相向，蒙古大軍和明朝都曾入侵，卻都被越南擊退。

越南語源自於澳亞(Austro-Asiatic)語系，又受到漢文、藏語、泰語的影響，要學越南語的發音並不容易，其基本音節有六種語調，意思完全不同，很容易發生混淆。西元 1627 年，明天啟七年，年僅二十七歲的法國青年耶穌會傳教士羅德(Alexandre de Rhodes)，將越南使用千餘年的漢字改成目前的通用羅馬拼音字越南文國語(Quoc ngu, 承繼漢唐時代的語音，與今之閩南音同)。

但是河內現今仍保存完好的文物，在著名的文廟(Van Mieu)庭園中一處天光井池旁，參天古木群下有著八十二塊石龜所駝負的石碑上，刻記著從西元 1442-1779 年共 1306 位進士的姓名、詩文及其學術上的成就，他們是研讀文學、哲學、中國古文與越南歷史，經過考試取得資格的。因此，我們深深了解北越人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法國人在西元 1915 年(順化則是在 1918 年)，下令停止了越南的科舉考試，並嚴格禁止中文的使用達七年之久。可是在越南的村落中，這些被法國人禁止的中文與古越文，仍然被使用至今。

清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清朝還正式賜予國號「越南」，直到清光緒十一年(西元 1885 年)，清朝與法國簽定天津條約，才放棄越南的宗主權，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國名被改為「南部越南交趾支那」(Southern Vietnam Cochinchina)，為法屬支那(柬、越、寮)之一員。因為曾受法國人的殖民教育，現在老一輩的越南人，還會說法語。而靠近中國地區的北越人，或許祖先來自百越，仍然聽得懂閩南話或廣東話。

西元 1930 年胡志明在共產國際組織協助下，在香港創立越南共產黨，西元 1941 年在中國南部成立越南獨立同盟（越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法軍展開游擊戰。西元 1945 年法軍被日軍解除武裝，撤離河內，越南保大皇帝（Bach Dinh）宣布獨立，但實權仍在日軍手中，同年八月日本戰敗投降，越盟發動起義，保大皇帝遜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獨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負責解除越南南方日軍武裝的英國，竟然支持法國捲土重來，所以爆發了第一次印度支那（Indochina）戰爭（1946-1954），後來法軍在奠邊府（Dien Bien Phu）戰役中敗北，法軍自越南全面撤退，經日內瓦協議（Geneva Accord）以北緯十七度為界線，將越南臨時分為南北，北方由胡志明（Ho Chi Minh）領導，稱為北越；南方為吳廷琰（Ngo Dinh Diem）任總統的越南共和國。

越南分為南北之後並不平靜，北越屢次潛入南方宣傳統一及游擊戰，導致美國派兵干涉，終致引起第二次的越南戰爭（Second Indochina War 越戰，1965-1975 年）。但因美國國內的反戰聲浪很高，西元 1973 年美國與北越簽下停戰協定，美軍自越南撤軍。

西元 1975 年越戰終止，北越共產黨軍隊全面解放越南，次年，南北越正式統一，成立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並將首都遷往河內（Hanoi），將西貢改名為胡志明市。目前全國領土面積有 329,556 平方公里，總人口數約為 7,756.2 萬人（有說是 7020 萬）。

後漢獻帝興平二年（西元 195 年），著有《牟子理惑論》的倉梧學者牟子到交趾避難，據說此時越南佛教是由中國傳入。故有學者楊曾文指出，西元二世紀末，大乘佛教從中土傳入越南，在四、五世紀得到較大的傳播。後從中土又傳入“禪宗”、“淨土宗”。從九世紀到十三世紀末，越南形成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屬於禪宗系統的“無言通派”、“草堂派”和“竹林派”，並先後被「李朝」（西元 1010-1224 年）和「陳朝」（西元 1225-1405 年）定為國教。近代越南佛教是佛教與儒學和越南民族信仰相結合的宗教，有其獨特的色彩。

西元六世紀末，由中國學禪後又進入越南的印度僧人滅喜（毘尼多流支）在越南河東建了法雲寺，成立滅喜禪派。「前黎朝」時的萬行禪師是滅喜的第十二代弟子，萬行禪師在「前黎朝」曾為國師，後來支持李公蘊（Ly Cong Uan）建立萬春王朝（Van Xuan）的「李朝」，又曾度千餘人為僧，所以“滅喜派”在李朝前期興盛一時。

西元 820 年，唐憲宗元和十五年，唐僧人無言通在越南北部建立一座建初

寺。李朝太宗帝曾出家成為“無言通派”第七代禪師，作有一偈：「般若真無宗，人空我亦空，過現未來佛，法性本相同。」可見禪宗無言通派對李朝有很大的影響。

西元十一世紀時，李太祖（Ly Thai To）來到大拉（Dai La），忽然看到一條金龍從湖中升起，便決定將首都由華閩（Hoa Lu）遷至大拉，並將大拉改稱昇龍。中國禪宗高僧草堂（雪竇明）在昇龍（河內）開國寺建立禪宗“草堂派”。當時越南皇帝李聖宗（Ly Thanh Ton）鑒於國內佛教教派眾多，希望能夠統一各派，把神權操控在手中。於是他看重草堂禪師，尊之為國師。

陳朝仁宗（西元 1279-1293 年在位）好佛，禪位給太子，在元成宗大德三年（西元 1299 年），往安子山出家修行，自稱“香雲大頭陀”，後南遊占城，返越後又自號“竹林頭陀調御覺皇”，又號“竹林大師”。他是越南自創禪宗派別“竹林派”的第一代祖師。

有著越南民族特色的“竹林派”，宣揚「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禪宗思想；第二代祖慧宗禪師的一首禪詩曰：「迷去色空色，悟來色無空，色空迷悟者，一理古今同。」元成宗元貞元年（西元 1295 年），陳英宗遣使向中國求《大藏經》回國頒印，西元 1299 年印《佛教法事》、《道場新教》頒行天下，「陳朝」佛教至此極為興盛。後來也出現了蓮宗派和觀禪派等，除了奉行臨濟宗禪法以外，還主張禪淨融合、禪教一致的思想。

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舊名西貢（Saigon），原是南越的首都，因受到法國人的苦心經營，有“東方小巴黎”之美稱。胡志明市最古老的建築物興平郡覺林寺古蹟，是中國明香季瑞龍居士創建，建築的風味有點像台北的龍山寺。此建於十七世紀末的伽藍寺（Gia Lam Pagoda），曾在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重修，寺內樑柱上有越南古文字刻成的鍍金碑銘，牆上掛有歷代高僧像，並有精美的菠羅木雕像。

胡志明市內另有色彩最富麗堂皇的玉皇寺（Ngoc Hoa Pagoda），大約在西元 1892 年由廣州的佛教徒所建立。建於西元 1803 年的覺圓寺（Giac Vien Pagoda），寺中保存有 153 尊手工精美的雕像，裡面有一頂珍貴華麗的轎子，是阮朝皇室贈送給創建高僧覺圓的。

胡志明市最新也最大的佛寺永嚴寺暨佛學院（Vinh Nghiem Pagoda），落成於越戰期間西元 1973 年，由於曾獲得日本友誼協會的協助，此寺外觀具有日式佛塔的特色，融合越南傳統佛教建築所建造的。寺之正殿供奉一尊大佛，另有一座七層佛塔，塔的每一層都供奉著一尊佛陀的雕像，此外還有日本曹洞宗寺廟捐

贈的鐘樓。主塔後的三層靈骨塔則存放骨灰罈和牌位。

胡志明市的堤岸區（Cho Lon）是中國城，有一座十七世紀末期建造的伽藍寺（Chua Giac Lam），是西貢最古老的建築，也是一座祖傳的寺廟，主殿內供奉著一尊尊雕工精美的鍍金佛像，其他如判官、閻王與觀音等神祇。位於胡志明市中心北方的麥提路（Mai Thi Luu），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玉皇廟（Phuoc Hai Tu），是在西元 1909 年由中國佛教徒所建造的，是胡志明市色彩最鮮豔的寺廟。廟內供奉著主神玉皇大帝，右邊則是十八支手的准提佛母。胡志明市東南約 128 公里的半島海濱頭頓（Vung Tau）的中灘山坡上有一座臥佛寺（Niet Ban Tinh Xa），內有水泥塑成十二公尺長的臥佛，臥佛腳底刻著佛陀的事蹟。

位於越南中部的順化（Hueh）原為占婆王國所屬的烏里州，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西元 1306 年），占、越聯姻關係才併入越南的版圖。而從西元 1802-1945 年間一直是越南最後一個王朝「阮朝」的王都，目前大內皇城以及嗣德皇帝、啟定皇帝、明命皇帝、紹治、嘉隆的皇陵，都是值得一看的古蹟。

而第一位統治順化的阮璜（Nguyen Hoang）於西元 1601 年建立了天姥寺（Thien Mu Pagoda, Chua Thien Mu），據說天姥寺的位置是龍脈之首，不僅地理風水好，而且風景視野最佳。天姥寺的入口台階就設在香江河畔的山坡上，寺院正前有一座八角形的七層慈悲塔，高 21.24 公尺，是以運自占婆的磚頭所建造，“高塔映江”是本寺的美景之一。

據說此塔曾造七尊佛像於其中，是分別代表佛陀的七種不同化身，塔內有一尊鍍金的笑佛，及三尊細緻優美的佛像，塔外有六尊守護神塑像捍衛著。天姥寺的主殿大雄寶殿建在花園內，裡面第一間佛堂有一尊銅鑄的彌勒菩薩像，殿後還有官（關）武祠（Quan Vo）與官（觀）音寺（Quan Am）。

此外，有一塊大理石龜馱著的石碑，上面刻記著天姥寺宣揚越南佛教的貢獻。順化的寺廟建築大多與自然環境配合，常建在樹林茂密的山丘上，或建于水流緩和的江河邊。建築物上貼有金箔，或鑲嵌貝殼和陶瓷，蓋瓦、利用琺瑯等技術，比較起來色彩豐富，更有求奇的特點。

北部的河內（Hanoi）古稱昇龍（Thang Long），是現今“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也是北越最大的城市，東西文化兼具，城內有許多帶著與中國樣式很相似的傳統建築，還零落的散立了早期法國式的建築。市北紅河旁有一湖，湖邊種滿桃樹，此湖叫西湖（Ho Tay、West Lake, Lake of Mists 古稱“迷濛湖”），在其碼頭附近的小半島上，有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西元 545 年），越南反抗中國人統治的民族英雄李賁（Ly Bon，可能是漢化的越南人）所建的古剎開國寺塔

(Khai Quoc Pagoda)，是十七世紀遷到現址的，並改名為衛國寺 (Tran Quoc Pagoda，也稱“鎮國寺”)。衛國寺是越南歷史最悠久的寺塔之一，塔裡有一座西元 1639 年，明崇禎十二年時豎立的石碑，記述著衛國寺悠久的歷史。

「李朝」聖宗時期建築的寺廟通常是正方形布局，保存至今的有東京灣 (Gulf of Tonkin) 岸海港海防 (Hai Phong) 的祥隘寺，高九層；安子山華安寺 (在今廣寧省境內，越南最著名的古寺)；在河內有香海寺、招禪寺、石婆寺、獨柱寺 (又名“一柱廟”，建於蓮花池中。) 等。「李朝」的建築風格都與中國同類建築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越南民族的特點。越南的傳統建築，人民的長相較黑瘦外，其生活的習慣，有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總令人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傷，好像久遠不曾見面的兄弟。

○台灣的佛教與建築文化

漢傳佛教徒聚會修行的地方—齋戒場所，今天在台灣 (Taiwan) 有以下不同的名稱如：寺 (Buddhist temple)、禪寺 (Ch`an temple)、禪堂 (Meditation-hall)、精舍 (a pure abode)、蓮社 (The White Lotus sect)、堂 (court)、佛堂 (Buddhist court)、庵 (A thatched hut, shelter, a small temple)、蘭若 (Aranya, forest)、道場 (platform)、講堂 (The preaching hall, lecture hall)、法院、禪苑 (Ch`an park)、行苑、竹苑 (bamboo park)、巖 (cliff)、閣 (A pavilion, chamber, council)。

《台灣通史》指出鄭成功之嗣子鄭經「以承天府 (今台南市) 之內，尚無叢林，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是有書記載台灣建佛寺之始。因為大陸移民潮的傳入，屬於“齋教”信仰的在家佛教流行於台灣。早期台灣寺廟建築是繼承中國南方的建築傳統，幾乎是以寺廟作為部落的文化、經濟中心。採用閩南的建寺方式，以中軸線布局興建。所以，台灣的佛教建築早期以中國南系的閩南建築式樣為多，被稱為“南方廟”，裝飾比較華麗，用色濃烈，對比鮮明，常見雕龍石柱及描繪或雕刻有民間忠孝節義的故事，是隨著閩、粵移民的宗教信仰傳入台灣。

清光緒二十一年 (西元 1895 年)，台灣、澎湖被日軍佔領以後，日系佛教建築也引進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建築就有了三大系統：閩南傳統式、日本東洋風式和西洋歐風式。光復後，純佛教的“北方廟”是隨著大陸新移民傳過來的，其北方宮殿式的外觀，則較為簡潔、淳厚。目前台灣所管轄的領土有 36, 179 平方公里，人口有 2, 200-2, 300 萬人。

閩南傳統式建築是以主殿中軸為中心形成的三或四合院型制的寺廟群，可是重視木、石雕的精細表現，與中國北系建築的重視彩繪比起來，顯然還更花俏許多。其刻意追求細部繁複的雕琢，幾乎到了無處不施雕、無處不上彩的地步。重建前的艋舺龍山寺前殿採用“單簷三川式”脊，正殿則採用一條龍式屋脊，緩緩的弧線兩端燕尾起翹，脊上有龍鳳搶珠、人物、花草裝飾。前後殿之間以高牆迴廊連結，採縱向擴建方式修建。

日本東洋風建築樣式比較厚重，屋脊、垂脊均為平直，脊上無飾物，以黑瓦取代琉璃瓦，以歇山面向前，或為“唐博風”的正面。已拆除的善導寺原來的大殿就是一例，不知是海島氣候潮濕，或係屬日本遺風，這種建築自從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由於仇日的心態導向下，並未鼓勵維修，任其頹敗，至今幾乎已難再見。

也是在日據時代留下來的西洋歐風式建築，以后里的毘盧禪寺、觀音山的凌雲禪寺為代表，採用鋼筋水泥建材配磚砌牆修建。日據時代的日本崇仰歐風的心態很重，現今的總統府就是最大的歐風建築。所以，在西元 1927 年，昭和二年建築的毘盧禪寺就見不到東方建築的語彙，主殿前的五根圓柱柱頭是希臘“愛奧尼亞柱式”（Ionic order）的裝飾，為雲狀卷渦，但柱身無凹槽；凌雲禪寺的舊法堂是二層的磚石砌造建築，正面有西洋式山牆、迴欄，方柱頭是希臘“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裝飾，但柱身無凹槽，為樣式厚重的圓柱；台中寶覺寺大殿迴廊前之石柱下方上圓，柱頭是希臘“哥林多柱式”（Corinthian order）的裝飾，以棕櫚葉狀做成，看來簡潔典雅。其實，古犍陀羅地區的佛教建築就是希臘建築，彷彿時空又回到二千年前當時。

根據江燦騰博士的研究調查，台灣佛教遲至日據時代才有「大法脈」的出現，「大法脈」是指佛教道場在佛法傳承上，有法脈的源流和繼承，同時也擴展根本道場之外的外圍道場或佈教區域。目前的台灣佛教有四大法脈包括：基隆月眉山的靈泉禪寺派；台北觀音山的凌雲禪寺派；苗栗大湖法雲禪寺派；高雄大崗山的超峰寺派。

大崗山法派的核心寺是超峰寺，為清朝乾隆年間的台灣知府蔣允焄所創建，初期並無大發展，直至日據時代以後，來自台南的僧侶周義敏林永定師徒，才將超峰寺經營成大崗山法派的大本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部以大崗山為軍事要塞管制區，以超峰寺容易成為美軍轟炸判讀的目標為由，迫令大崗山僧尼下山。林永定門徒陳永達因此率僧尼，在山下另建新超峰寺。

大崗山法派在歷經近百年的發展，衍生出法智法師的舊超峰寺、能學法師的

新超峰寺、梁開吉的蓮峰寺、開會法師的龍湖庵、開證法師系的宏法寺與義永寺、永隆法師系的高雄內惟龍泉寺、圓宗法師的田寮日月禪寺、開通法師的嘉義德源禪寺、圓融法師的屏東東山禪寺及天乙法師、心淳法師系的興隆淨寺。

台北市忠孝東路上，離火車站十分鐘路程的善導寺，建於民國十四年。中國佛教會也設立在此。近年新建的九層高慈恩大樓，就已經不是傳統式的佛殿，像一座中國式的辦公大樓。今年又將日式建築樣式的大雄寶殿拆除，另新建中。

萬華艋舺龍山寺，是二百多年前，有船夫掛遺一個“龍山寺觀音佛祖”的香火袋在當地，因顯出燐火般的火光，受到奉祀靈驗後，參拜的人逐漸增多，最後才興建廟宇的。

介紹台灣地區的寺廟建築很多，此欄僅約略提及她的特點，希望讀者另行參閱其它相關書籍。

台灣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

台灣在日據時代，受到日本人對神道與佛道不分的影響，也產生神佛共祀的寺廟。也曾經因為日本採取“皇民化”的政策，所以聰明的台民便將含有民族信仰的神祇供入佛寺。日本政府對殖民地的宗教政策，採取偽裝宗教自由期、籠絡台灣信仰期、逐漸消滅期。是故為了保存民間信仰，台灣佛教以「佛道一寺」居多。

中國民間之所以接受神佛共祀的原因，源自宋徽宗宣和元年（西元 1119 年），歲次己亥，徽宗趙傑受道士林靈素所惑，以不廢佛教，則為中國禮義之害，乃改佛刹為宮觀，稱佛為「大覺金仙」，使著天尊之服，連帶也使宋之譯經院消失，並改稱菩薩為「大士」、羅漢為「尊者」、和尚為「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後來造成佛、道（Daoism）不分，佛教成為民俗信仰，華麗而庸俗。

宋朝以後，中國倫常禮教的觀念日益加深，在信佛的閨女房裡供奉一尊男性的菩薩，是十分不妥當的，女性觀音自然成了婦女虔誠供奉的菩薩像了。台灣的寺廟大都是婦女在初一、十五去燒香祈求平安的地方，供奉有現女性身的觀世音菩薩，就不覺稀奇了。但是稱呼為觀世音大士。這是受到宋朝佛道不分的影響。而且以“媽”的暱稱稱呼觀世音菩薩為“觀音媽”（Guanyin Ma），將菩薩與林默娘成道後被帝王封的天上聖母——“媽祖婆”同視。媽祖婆的信仰是因為施琅攻打澎湖，受到媽祖的護佑，清朝對媽祖大加封賜。台灣熱烈信仰媽祖的風俗，應歸功於滿清政府的鼓勵。

「佛道一寺」的南華普門寺的啟用

西元 2000 年 9 月 6 日，位於台灣花蓮縣的南華普門寺，在建造近六年後，以新興完成東台灣最碩大的廟門，舉行隆重的「開廟門」儀式，並接受各方善信的朝拜。台灣的佛道寺廟建築，常因經費不足，只要主體建築與廟門安裝完成，便以傳統「開廟門」儀式，昭告天下開始啟用。如此善信的捐助也比較能夠凝聚。

台灣的寺廟不管佛道兩教，都開有「三川」門，中門通常都不開啟，只有重大節慶或有高官蒞臨，寺廟才會敞開中門，平時都開左右兩門供進出。台灣傳統道教的寺廟中門門神，常是唐太宗的大將秦瓊與尉遲恭，以象徵忠勇的歷史人物為守門神。南華普門寺供奉的主神就是觀世音大士，大門門神則請哼、哈兩將守門，有別於傳統道教。綠臉的哼將軍抿著嘴唇，象徵超脫人世，以冷眼看人間；紅臉的哈將軍雖看破俗事，但仍能笑顏以對。普門寺的左右兩側門，則以持利劍的「風」將軍、斜抱琴器的「調」將軍、持傘的「雨」將軍、捧龍的「順」將軍四大護法守護，祈福人間風調雨順。

開廟門的儀式有請煞、潔淨的施法誦經，一一驅趕潛藏在寺中的鬼邪。而最重要的是安奉龍神，以迎接象徵祥瑞的龍神，同時驅除白虎星防止它在廟裡作怪。最後由主持道士親繪「九宮八卦」圖符交與廟方，作為鎮廟之用。

○小結

“像法”是各國大師們造成的，大師如果都說“正法”，“像法”就不會來臨，也不會存在。自古以來帝王都把宗教視為教化人民成為“愚民”、“順民”的工具，強力的加以干涉，不希望民眾太聰明，只希望國民都是“順民”，同時讓每一個人都追求往生，就無暇質疑施政的無能，也可以用來模糊政績的錯敗。佛教的理念太有智慧了，帝王當然會對禪宗等派別加以限制，似乎早期台灣的佛教也有如此的傾向。